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7/394
22 Sept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61(e)

全面彻底裁军：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

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

秘书长的报告

1. 大会1990年12月4日第45/58 0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曾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考虑到会员国的观点及其他有关资料，从事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2. 秘书长依照该决议内载的请求，谨向大会转送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的文件。

* A/47/150。

92-41684 041192 061192 091192

附 件

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

目 录

<u>章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秘书长的序言		5
送文函		7
一、导言	1 - 18	11
二、国际安全环境目前的趋势	19 - 75	14
A. 从冷战对峙到合作	19 - 38	14
B. 加强区域合作及联合国的作用	39 - 73	19
1. 中美洲	42 - 49	19
2. 东南亚	50 - 54	21
3. 非洲	55 - 61	23
4. 中东	62 - 66	26
5. 欧洲	67 - 73	27
C. 现有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和危险	74 - 75	29
三、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实质和主要特征	76 - 130	30
A. 各种研究报告的调查	81 - 95	31
B. 防御性安全	96 - 130	36
1. “防御性安全”的目的	97 - 102	37
2. 政治考虑	103 - 110	38
3. 军事考虑	111 - 130	39
(a) 战略概念	113 - 116	40
(b) 部队姿态	117 - 130	41
四、实施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问题	131 - 153	44
A. 武器系统	133 - 139	45
B. 攻击和反攻能力	140 - 142	47
C. 一些国家的集体防御和联合承诺	143 - 149	47
D. 双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	150 - 153	49

<u>章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五、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战略和措施	154 - 256	50
A. 与《联合国宪章》一致的集体安全、区域性 及其他合作安排	158 - 167	51
B. 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	168 - 212	55
1. 情报措施	173 - 180	56
2. 通讯措施	181 - 189	59
3. 资料检索措施	190 - 196	62
4. 通知措施	197 - 200	64
5. 限制措施	201 - 206	65
6. 从近期经验得到的教训	207 - 212	67
C. 武器限制与裁军	213 - 243	69
1.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215 - 228	70
2. 常规武器	229 - 243	73
3. 遵守情况的核查	244 - 256	77
六、结论和建议	257 - 278	81
A. 集体安全与合作安排	264 - 268	83
B. 公开性、透明度与建立信任	269 - 271	84
C. 改革军事力量的结构	272 - 276	85
D. 走向“防御性安全”	277 - 278	86

词 汇

案文内提到的协定全称

《生物武器公约》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
《欧洲常规部队条约》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
《孔塔多拉文件》	《孔塔多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文件》
《日内瓦议定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斯德哥尔摩文件》	《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题斯德哥尔摩会议文件》
《裁减战略武器条约》 (《裁武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裁减和限制战略性攻击武器条约》
《中程核力量条约》 (《中导条约》)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1990年维也纳文件》	《1990年依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维也纳会议结论文件相关规定举行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
《1992年维也纳文件》	《1992年依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维也纳会议结论文件相关规定举行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谈判维也纳文件》

秘书长的序言

大会1990年12月4日第45/58 0号决议曾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考虑到会员国的观点及其他有关资料,从事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秘书长所任命的研究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合格政府专家小组于1992年7月17日其最后会议上一致核可了它的报告。

本件报告一开始就叙述有关本研究的提议的缘起背景,那就是,因为冷战结束而生的可喜的发展和新威胁的出现和长期未决问题的再度出现。有人辩称,这些机会和挑战已使国际社会有一种独特的机会得以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设法找到解决安全的军事问题的有效的、适当的共同办法。为此目的,应提出一个防御性安全的定义,以作为一种工作方法。

本件研究报告进而审查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目前趋势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到和平解决争端和力行约束以及在发展、维持和使用武装部队上的防御性方针。在这方面,它指出,已经改变的国际环境已使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和讲坛在解决冲突上能够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其后为有关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实质部分及主要特征的讨论。调查了现有的旨在用实现国力趋向防御性的方法来消除军事力量姿态的攻击性质的各种研究报告和模式。此外,本研究报告还讨论防御性安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并就此指出防御性安全为何异于这些现有的模式。

它还分析或许会妨碍实现军力转向防御性质的政治和军事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将探讨的问题包括:难以或根本不可能区别攻击性和防御性武器系统维持有效的反攻击能力与同时亦不得摆出攻击姿态的两难局面;集体防御和各国共同承诺防御性安全的各种影响;以及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推行防御性安全。

在论及这些难题时将讨论或许有助于将军事姿态由攻击性改为防御性的战略和

措施。这些战略和措施包括：有效实行《联合国宪章》内载集体安全体系以及符合《宪章》的区域和其他合作办法；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军备限制与裁军措施，以及核查遵守情况。本研究报告在结论部分将建议一些或许有助于创造防御性安全成为优势的局面的工作，以供各会员国参考。

秘书长希望表示他衷心感谢专家小组编写本报告，兹提交大会供其审议。

送文函

1992年7月17日

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我谨随函提出你依照大会1990年12月4日第45/58 0号决议第3 段任命的研究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

你任命的政府专家名单如下：

Alberto E. Dojas先生

参赞

国际安全、核事务和空间事务司

外交和宗教事务部

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Mohamed Nabil Fahmy

参赞

外交部长 政治顾问

外交部

开罗, 埃及

Wilhelm Nikolai Germann博士

上校(GS)

德国驻北约组织军事代表团

布鲁塞尔, 比利时

Boris Petrovich Krasulin大使

第一副司长

国际组织司

外交部

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

Francois de La Gorce大使

外交部

巴黎, 法国

Johannes C. Landman先生

参赞

荷兰出席欧洲常规部队谈判和

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代表团

维也纳, 奥地利

Henryk K. Pac先生

参赞

外交部

华沙, 波兰

Suleiman Sa' idu海军少将

海军总部

国防部

拉各斯, 尼日利亚

Farhad Shahabi Sirjani 大使

联合国事务主任

外交部

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Sheel Kant Sharma 博士

联合秘书(南方)

外交部

新德里, 印度

Nugroho Wisnumurti 大使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常驻

联合国代表

纽约

本报告于1991年5月至1992年7月间编写; 在此一期间内, 本专家小组在纽约举行了三次会议, 第一次集会于1991年5月20日至23日, 第二次集会于1992年1月13日至24日, 第三次集会于1992年7月6日至17日。

本专家小组希望表示感谢前任主管裁军事务部副秘书长, 明石康先生获得必要的预算外资源以期在配合本专家小组第二次会议方面举办了一次邀请世界各地专家参加的防御性安全问题讨论会。该讨论会于1992年1月9日至11日举行; 它包含有几次全体会议, 以介绍各个专题和工作小组, 期能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些专题。专家小组欢迎该讨论会所提供的机会, 因为各会员国能够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探讨许多问题并

且得益于与会人员的不相同的背景和观点。

专家小组在进行它的工作时已收到若干会员国依照秘书长1991年2月28日按照第45/58 0号决议第2段内载请求发出的普通照会所提出的有关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专题的意见。已自下列国家收到了复文：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德国、荷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专家小组的专家希望表示感谢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协助。他们特别要表示衷心感谢担任专家小组秘书的裁军事务厅的Silvana F.da Silva女士和以私人身分担任秘书处顾问的Ivo H.Daalder先生。

政府专家小组要求我以其主席的身分代表它向你提出此一经过一致同意核可的研究报告。

研究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政府间专家小组

主席

鲍里斯·克拉苏林(签名)

一、导言

1. 1990年代正成为一个充满新的希望、担心和挑战的十年。主导国际政治四十余年的东西方冲突已于1980年代的最后几年结束。前对手之间的合作代替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和军事的对抗,主要以欧洲为中心,但也扩展到欧洲以外波及世界所有区域。新的合作途径因此而开启,使联合国以及各区域组织能够起到更有效的作用。各国日益希望利用区域和其他多边机构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是朝向履行《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承诺、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个令人欢迎的步骤。

2. 在存在这些令人鼓舞的趋势的同时,也仍然有各种长期的和新出现的风险和威胁,它干扰着国际政治的气候。历史悠久的区域争端不受冷战结束的影响而继续存在,而且有时更为剧烈,从而增加了暴力和战争的危险。为东西方政治和思想对抗而长期压抑的种族、民族、文化和宗教差别,正重新显现。这些差别所导致的冲突,有时可能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和不可预见的根源。此外,世界某些部分的军备水平,仍远远超过合法安全和防御的需要。

3. 此外,在有些地区,即使国家的军事安全已不再是国家和国际关切的首要问题,但其他的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和发展。这些因素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环境退化、极端贫困、疾病和流行病、毒品、政治动荡、难民、歧视和压迫,或是人权原则和承诺的全面压制,都给个人、社区、社会以及全世界的安全带来威胁和危险。在此意义上的安全,是一个包含一切的概念,不仅取决于消除暴力和有效预防或排除侵略,而且取决于人和社会基本需要的改善。

4. 这些威胁日益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警惕。其中的许多威胁只能在全球或区域合作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人们可以期望的是,随着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安全的进展,可以释放出额外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可以部分地用于解决非军事安全的各种问题。在此方面,联合国可以起到关键作用。¹

5. 这些问题不属于本小组的任务范围,但鉴于其重要性,现在导言中加以简要

论述。然而必需指出,其中的某些威胁可能需要采取军事手段,并影响邻近国家的安全。例如,政治动荡激化为可能蔓延到国界以外的内战,就是这种情况。

6. 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再加上区域和其他多边机构和组织加强了在取得国际和平与稳定方面作用,肯定增加了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采取充分和有效的共同办法,解决原有和新的威胁和风险的军事方面的前景。在继续保持超过真正安全需要的武装部队和为防御以外目的使用这些军队的世界上,只有把军队的使用可靠地限制在《联合国宪章》所允许的行动,上述前景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7. 联合国大会在其1990年12月4日题为“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第45/580号决议中,由于承认了这种相互关系,因此涉及到军事能力的作用以及在此方面的战略概念。大会承认已出现军备管制和裁军、结束区域冲突以及推动国与国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机会,决议力求“确保所有国家现有的武装部队只是用来防止战争、或在和平受到威胁、遭到破坏及出现侵略行为时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个别和集体自卫并采取集体行动,而自卫能力要反应真正的防卫需要。”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将此要求最好地化为现实。

8. 大会在该决议执行部分力求解决这些问题,该部分宣称:

“1. 认为就以防卫为目的安全概念和政策展开国际对话对促进实现裁军和加强国际安全进程极为重要;

“2. 请会员国在双边一级,特别是在区域一级,适当时也在多边一级,发起或加强关于以防卫为目的的安全概念和政策对话;

“3. 请秘书长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考虑到会员国的观点及其他有关资料,从事关于以防卫为目的安全概念和政策的研究,提交大会第47届会议。”

9. 本研究是响应执行部分第3段的要求。它探讨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是否可以一并解决现有的和新的威胁和危险,同时加强近几年的积极发展。研究承认安全的其他方面日益重要,但重点是军事方面和在致力于更广泛地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加强防御内容的方法。

10. 关于安全的军事内容,哪些内容构成合法的防御军事能力和武力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联合国宪章》提供了制订共同标准的框架。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和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此外,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这些规定同时包含一项自我克制的义务,在发展军事能力时强调防御。

11. 为了行之有效,在各国的宣言和实际军事能力中,都必须明确体现自我克制的义务和军事事务中的防御性。换言之,各国必须赋予防御性安全概念具体的内容,要做到这一点,所奉行的政策必须符合这些概念的防御取向以及对相应武力态势的明确陈述。这涉及到一个有效军事系统不可缺少的全部内容,包括理论、组织、装备和军备、指挥、管制和通讯、作战计划与后勤。在“概念”和“政策”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安全概念是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建立其安全、如集体安全所依据的不同基础。安全政策一般来说是除其他外通过保持和发展军事能力维持安全和增进稳定与和平的手段

12. 本研究探讨了各种现有的防御安全概念和政策,考虑到世界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和安全条件,以及政治和安全要求。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这些概念和政策中的一般内容,使其能够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有益的贡献。根据这些分析,本研究提出“防御性安全”的概念,作为一种工具,其定义为通过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有效和具体措施,逐步达成和维持一种和平和安全条件,在此条件下:

- (a) 建立和保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 (b) 和平和公平地解决争端,从而排除武力的使用;
- (c) 通过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以及武装部队按照防御取向的改组,消除发动突然袭击和发起大规模进攻行动的能力。

13. 本研究讨论各国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为此目的,本研究作出如下结

构安排。

14. 第二章讨论最近的事件及国际安全的目前趋势,以便探讨目前可能存在的和平解决争端和限制发展、保持和使用武装部队的政治机会。

15. 第三章考查对以防御为取向的概念和政策的现有研究与模式,分析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政治和军事方面,同时考虑到其固有的限制。

16. 第四章讨论可能妨碍有效执行这些考虑的政治和军事技术问题。

17. 第五章讨论旨在减轻这些问题的战略和措施。

18. 第六章是由前几章得出并经过论证的结论和建议。

二、国际安全环境目前的趋势

A. 从冷战对峙到合作

19. 整个战后阶段里,冷战至少在三个重要方面支配着世界政治。首先冷战将绝大部分工业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体系,各以一个大国为首。其次将庞大的经济和人力资源用于军事目的。最后冷战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所有国家。在这一阶段中,不结盟运动于1961年形成,在冷战两极分化以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论坛,追求共同目标和利益。直到1980年代末冷战结束,国际政治都受到这些因素的重大影响。

20. 由于往往首先是对峙,其次才是合作,两个对立体系之间互相作用的程度是有限的。但是,受到担心军事冲突可能升级的遏制,这种对峙冻结了整个欧洲的领土和政治现状。主要是为了降低紧张局势才进行对话,包括军备控制对话,而且大体上限于互相关切的领域。

21. 在冷战期间,安全往往用军事术语来介定。其后结果在欧洲最明显,东西方界线的两边陈列了大量的部队。

22. 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世界其他部分逐渐争夺势力范围逐渐,每一方都试图利用种族或民族冲突或紧张局势。同时地方领袖又设法将大国拖进冲突的自己一

方。外部卷入的方式是向对立双方提供军事或其他手段,往往使区域冲突更形恶化。

23. 冷战以及冷战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结果之一是,1961年25个国家来到贝尔格莱德组成不结盟运动。不结盟运动制订了一条脱离互相竞争的大国的独立的政治道路。不结盟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不结盟运动确保扩大国际议程,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关切,而不再完全受冷战引起的问题的支配。除此而外,不结盟运动将联合国变成追求它们目标的主要场所,影响了解决国际问题,包括发展问题和裁军问题的范围。

24. 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变化,起初是缓慢的,包括1980年波兰团结运动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戏剧性的挑战,然后到1980年代后半期速度开始加快。1985年新掌权的苏联领导认识到紧急需要为苏联和东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和经济停滞寻找答案。随后采取改革和开放政策是认为苏联和东欧要取得成功主要依靠改变经济优先事项,由军事转向民用部门以及依靠西方技术和财政援助。这引出苏联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其中的一个内部容是努力说服西方苏联不怀有侵略意图。

25. 西方十分满意地欢迎这些变化,并且对结束冷战的政策作出了积极反应。其结果是欧洲结束分裂,合作战胜对抗,可以用新的精力来处理一些区域性问题的。

26. 欧洲结束分裂最富戏剧性的表现是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随后,第二年10月德国统一。1990年11月最直接卷入冷战的国家明确承认领土和政治现状解冻。在“二十二国联合声明”(A/46/68,附件)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声明“分裂和对峙的时代已经告终”并宣告“在欧洲内部关系的新时代之始,他们不再是敌人,而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互相伸出友谊之手”。

27. 冷战结束对这一区域具有重大影响。在东部,华沙条约组织于1991年7月正式解散,代之而起的是符合这些国家走向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愿望的新合作形式。另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91年12月不复存在,新独立的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当时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在此以前,波罗的海各国

重新获得独立。

28. 在西方,北大西洋公约对这些变化作出反映,重申必须以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第2和第4条规定的政治手段实现其目标。北约领导人在1991年11月罗马首脑会议上宣告联盟的“安全政策现在可以建立在三个互相加强的因素之上:对话;合作;维持集体防御能力”。²在同一场合通过的“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写下了这些因素的实际内容。由所有北约和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参加的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的建立使对话和合作的承诺体制化。

29.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范围内加紧思考冷战结束使全欧洲在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也参加的。1975年于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中,当时参加会议的35国同意了若干关于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经济合作和社会正义以及军事安全的承诺。若干大小后续会议讨论了如何执行这些承诺并就新的措施达成协议。这样,赫尔辛基进程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新纪元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使政治对话和合作具有新的质量,使欧安会进程转变成一种更体制化的关系。

30. 1990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结束时,当时欧安会的34个成员国通过了“巴黎新欧洲宪章”(A/45/859,附件),其中它们承认“欧洲对峙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终止”。它们还重申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十项原则仍然有效,宣称十项原则构成它们关系的基石。最后欧安会成员一致同意创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长组成的理事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开始将欧安会进程体制化;一个更经常举行会议的高级官员委员会;在维也纳设立一个冲突预防中心;在布拉格设立一个秘书处;在华沙设立一个自由选举办事处(后来改名为民主机构和人权办事处)。

31. 在加速减少军事对峙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的第一步是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题斯德哥尔摩会议于1986年9月胜利召开。会议增加了初步建立起的信任,并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同意的建立信任措施扩大到若干领域。会议要求对超过某一水平的军事活动事前发出通知;具体规定有义务邀请所有欧安会

国家派观察员观察所通知的军事活动；规定每年交换关于所有值得通知的军事活动的预测；并规定从空中和(或)地面进行实地视察来核实是否遵守协议的措施，并无权拒绝。³

32. 这些措施除了说明将显著增加透明度之外，会议有关核查的协定最杰出的特点是包括强制性实地视察。这是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同意将实地视察作为军备控制核查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33. 1980年代后期的政治变化使得欧洲大量减少常规部队的前景大大明亮起来。到1990年11月，22个北约和华沙条约国家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⁴中同意将它们的五类常规军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这五类被认为对攻击行动具有最关键的意義。全面实施该条约将确保从欧洲销毁或永远去除125 000余辆坦克、火炮、装甲战斗车、作战飞机和攻击直升机。除了限制部队和要求削减之外，该条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交换资料和核查规定。这些规定连同1990和1992年在维也纳协议的并且已经扩大到斯德哥尔摩文件的若干领域的新的建立信任措施，将确保在整个欧洲大陆组织和部署军事力量方面具有更高度的透明性。

34.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扭转了几十年来在欧洲扩大常规武装力量的作法，并且对实现首先在谈判任务中提出，并随后又在条约序言中重申的目标，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较低的水平上建立欧洲常规武装力量的安全稳定平衡，消除有害于稳定和安全的失衡，并高度优先地消除在欧洲发动突然袭击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35. 在两大国核能力方面也扭转了军事对峙。1987年12月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中程条约)⁵其中消除了射程在500至5 000公里以内的陆基导弹。四年以后在1991年7月，两国签署了《减少战略武器条约》，⁶根据这项条约，双方将它们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从现有水平减少约30%——这是第一次同意将减少核武器作为战略核武器控制协定的一个内容。中程核力量条约和

减少战略核武器条约中规定的广泛的核查制度包括国家技术手段,常规和突出性实地视察和影响重型轰炸机和流动导弹的作战限制。

36. 自签署减少战略核武器条约以来,已经出现了意义更加深远的核裁军。1991年9月,美国布什总统宣布单方面大量改变战略和战术核力量。一个星期以后,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宣布作了积极响应。根据这项倡议,将消除陆基战术核武器,并从水面船只、进攻潜艇和陆基海军飞机上去除一些非战略性核武器。其中许多武器将被拆除;余下的核武器将放置在美国和苏联领土中央地区。至于战略力量,两国同意取消重型轰炸机的战备状态,取消若干战略和空中发射导弹方案,并取消一些陆基导弹的战备状态。在这些倡议之后,并为了回应安全环境方面进一步的急剧变化,北约和俄罗斯联邦宣布进一步销毁它们还拥有的亚战略核力量。其结果是双方的亚战略核力量大约已减少80%。

37.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就可能进一步裁减核武器。仅仅经过五个月的谈判,美国和苏联在1992年6月同意各自将战略核武器由目前水平裁减70%。根据这项协定,每一方所部署的弹头不得超过3 000至3 500枚,消除一切多弹头陆基导弹并限制各方的海上弹头为1 750枚。至迟在2003年达到这一水平,但是也可能在2000年就达到,只要美国能协助俄罗斯联邦销毁应削减的力量。

38. 迄今为止已取得的全部军备控制,急剧扭转了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是东西方冲突开始以来就有的特征。各项协定合在一起的效果是,所有协定的缔约方在较低的费用和力量水平上,增加了安全。除此而外,各项协定所实施的核查制度是各国都接受深入视察,这不仅会防止不遵守情况,而且还提供所有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军事活动和力量规划的资料。其结果是军事活动和能力的透明度增加,提高了相互信任。所有这些协定为整个欧洲大陆创立一个有监测的安全区迈进了重大一步。

B. 加强区域合作及联合国的作用

39. 从冷战走向合作不仅仅是欧洲的现状解冻,在全球一级更加呈现一派大地回春的景况。国际安全环境目前的特点是,世界上某些地区朝向积极发展。这些地区的冲突大部分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在很多情况下,争端各方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好象更容易获得或得到接受。新的机会以及对解决国际争端更多的需求增加了在全球和区域各级对解决争端采取多边处理办法的可能。

40. 区域组织和论坛获得了更多机会在解决它们各自区域的国际争端方法发挥一项作用。在中美洲,“孔塔多拉办法”对于促使5个中美洲政府为解决其内外争端和冲突发挥一项重大作用。在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对于维持柬埔寨的和平进程至关重要。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于解决区域局势、特别是有关中东的局势开始发挥一项认真的作用。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参与调停某些领域的争端。在欧洲,区域组织在南斯拉夫危机中在这方面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41. 此外,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之间目前的合作态度开启了《联合国宪章》为有效解决国际争端所规定的机制,从而使联合国在解决很多争端方面发挥一项积极作用。联合国这项增加的作用也得到以下事实的证明:联合国在创立以来的头43年中一共进行了13次维持和平行动,可是自1988年以来即已进行了数字相同的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常常与区域组织合作,在中美洲、东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等领域发挥了一项积极作用。对其中的一些活动进行的扼要审查说明了多边机构最近加强的作用。

1. 中美洲

42. 该区域的一些国家首先进行了解决中美洲内部和国际争端的努力。1983年,由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组成的所谓“孔塔多拉集团”与中美洲五国政府(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展开了协

商,为该区域的政治问题谋求一项商定的解决办法。虽然1985年成立了由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组成的支助集团,在中美洲五国政府证明愿意自行解决问题以前,对于问题仍然不能取得进展。

43. 事情发生在1987年2月,当时哥斯达黎加的奥斯卡·阿里亚·桑切斯总统为该区域制定了一项计划。“阿里亚计划”成为中美洲五国总统在1987年8月7日举行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首脑会议时于危地马拉城签订的关于“在中美洲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的程序”协议的基础(A/42/521-S/19085,附件)。在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中,有关的五个中美洲国家同意在它们国家展开民主化进程、提倡民族对话、颁布全国特赦、实现真正停火和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它们又要求有关各方停止它们对非正规部队和叛乱运动的支持并重申它们以前作出的承诺,即防止利用它们本国的领土颠覆该区域其他国家。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国家成立了一个国际核查和贯彻委员会,成员包括: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外交部长、中美洲五国的外交部长、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

44. 为了执行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必须解决要求联合国解决的所有这三个问题。第一,为了执行民主化进程,尼加拉瓜政府同意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修订其选举法和程序并邀请国际观察员观察选举。观察选举由联合国核查尼加拉瓜观察团(联尼观察团)。这次联合国首次应邀监测一个主权国家的选举,代表了联合国在西半球首次的重要行动。⁷

45. 第二,为了核查对协议的安全承诺的遵守情况--包括停止援助非正规部队和叛乱运动的承诺和不允许利用一个国家领土攻击另一国家的承诺--安全理事会在1989年11月7日在第644(1989)号决议中同意设立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中美观察团)。

46. 最后,中美洲五国政府在1989年12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扩大中美洲观察团的职权,也包括核查该区域可能商定的任何停火和非正规部队的解散。在1990年2月25日尼加拉瓜举行选举后,新政府要求秘书长协助自愿遣散尼加拉瓜抵抗力量成

员。1990年3月,安全理事会第650(1990)号决议同意扩大中美洲观察团的职权,授权它接管和处置抵抗力量的武器、物资和军事设备。这项设备在1990年6月完成。

47. 联合国在处理尼加拉瓜局势方面的成功后来使安全理事会在第654(1990)号决议中欢迎秘书长为促进实现萨尔瓦多冲突取得谈判的政治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使两个当事方同意由联合国监测它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包括1990年7月达成的有关人权的协议。⁷ 1991年5月20日,安全理事会按照萨尔瓦多冲突双方的要求根据第693(1991)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进入萨尔瓦多,开始监测人权协议的任务。

48. 1991年9月对萨尔瓦多冲突达成解决,当时双方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在纽约会谈。“纽约协议”(A/46/502-S/23082,附件)除其他事项外,还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巩固和平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代表、马解阵线代表、政党代表、教会代表和联合国代表组成,以执行协议。该协议要求“净化”武装部队、减少军队的编制、不歧视向必须由文职领导成立的新的警察部队申请为成员的以前的马解阵线的战斗人员以及马解阵线家属和同情者有权保留他们以前占有的土地。

49. 1991年12月31日,在纽约的谈判上达成了解决的最后细节,并于1992年1月16日签订了一项这方面的条约《和平协议》(A/46/864-S/23501,附件)。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在第729(1992)号决议中决定扩大联萨观察团的职权,以包括核查和监测所有协议、特别是《停止武装冲突协议》和《成立国家民警协议》的执行情况。⁸

2. 东南亚

50.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了柬埔寨冲突取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展开了区域努力。这项行动在1988年得到了促进,柬埔寨冲突有关当事方首次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名特别代表也出席了这次称为第一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的会议。即进一步的区域努力之后,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共同主持下和在秘书长的参加下,1989年8月召开了巴黎柬埔寨问题会议。虽然所有柬埔寨当事

方同意接受柬埔寨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而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对于过渡时期权力分享安排的一场争端使选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51. 为了打破僵局,为了获得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的进一步努力,着重澳大利亚提出的一项建议,同时考虑到以前的区域努力所达成的广泛的谅解。该建议的要素包括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全国最高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合法机构和权利来源,在整个过渡时期,柬埔寨的主权、独立和团结将通过该委员会体现。该建议又预计全国最高委员会把权利授予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利机构(联合国权利机构)准备和进行选举。为了为进行选举创造一个必要的中立的政治环境,联合国权利机构将监督主要政府部门、包括国防、外交、公共安全、财政和新闻等主要部门的管理。此外,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将负责核查越南军队的撤退、停火协议以及停止向柬埔寨当事方提供武器供应。

52.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于争取柬埔寨冲突取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也作出一项重大贡献。它们在通过区域努力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精心拟订了一个政治解决框架(称为“框架文件”),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全国最高委员会。在1990年9月雅加达会议上,柬埔寨当事方全部接受了“框架文件”,以之作为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基础。“框架文件”后来得到安全理事会第668(1990)号决议的赞同后拟订成协议草案。

53. 1991年中以后,柬埔寨冲突取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加速。柬埔寨当事方本身在全国最高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中发挥了一项重要作用。1991年6月,它们达成了无限期停火和停止外国武器供应协议;7月它们同意邀请一个联合国特别小组访问该国,监督停火,并决定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全国最高委员会占有;8月,当事方同意减少柬埔寨军队的部队和武器数字并把反抗部队数字减少70%,并调动兵营的其余士兵和设备将由联合国监督;最后在9月柬埔寨当事方就如何进行选举达成协议——这是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主要障碍。这些成就为重新召开巴黎柬埔寨问题会议和签订1991年10月23日的《关于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参看A

/46/608-S/23177,附件)作好了准备。

54. 在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以及军事结构和核战略目前正在逐步变化的前提下,东盟在其于1992年1月27日和28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欢迎所有东南亚国家加入《友好合作条约》以便为合作提供一个共同构架;赞同现有论坛的作用和为加强安全问题方面合作进行的东盟内部对话;表示坚决实现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以及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承认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作用的中立性。

3. 非洲

55.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从开创起,就在调停和解决区域争端,并尽可能与联合国积极合作进行此事。非统组织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非正式方式,以集体的名义或以在任主席的命令,而非通过特别为此设置的所谓调解、和解、仲裁委员会的机关行事。非统组织过去十年来的显著努力说明如下:

(a) 乍得和利比亚的冲突是由非统组织调停的,而且在1981年促使该组织第一次尝试维持和平——只有尼日利亚派遣军队前往乍得,但是他们后来撤军,原因是成员国分摊费用困难;

(b) 卢旺达目前的国内冲突最近减轻主要是因为非统组织的调停干预;

(c) 苏丹去年五月与阿布贾的会谈是非统组织努力解决南部苏丹长达九年的国内冲突的一部分;

(d) 西非的加纳与多哥间的局势最近五年来已经和缓,是通过该分区域有影响力的成员国基于非统组织的共同利益行事;

(e) 1988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协助减轻布基纳法索与加纳间的紧张局势;

(f) 此外,目前西非共同体在利比里亚的所谓西非共同体监测团的监测努力大大有助于促成互斗的党派争取和平相处。

56. 非统组织的一些努力若非补充性,就是作为联合国的努力的开路先锋,例如

西撒哈拉和索马里的两个情况就是如此。

57. 1988年8月,摩洛哥王国和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统组织主席的联合提议,为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举行一次全民投票。该提议规定全民投票将由联合国与非统组织合作安排和监督。1991年安全理事会第690(1991)号决议,核可设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以管理和监督全民投票。同年6月已签订停火协定,并在三个月之后西撒特派团到达该区域时开始生效。最初预定1992年1月举行的联合国监督的公民投票延期到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能够解决全民投票的投票资格标准问题的歧见的时候。1992年6月,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代表参加尼日利亚的分开协商,以便找出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和途径。

58.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结束南非对它的占领的基础是1978年9月29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1988年末,南非接受该决议的条件,以交换古巴同意从安哥拉撤军。这个协定于1988年12月22日由南非、安哥拉和古巴签订。随着安哥拉协定的签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南非军队的停火于1989年4月1日起生效,因而推动了促成独立选举的七个月的方案。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平民组成人员于1989年5月到任,监督选民登记和安排选举。选举按照计划于11月初举行,使西南非民组在立宪大会中取得多数。此后商定宪法,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59. 此外,尼日利亚为促使联合国目前在索马里的的工作取得成果,已给西亚德·巴雷前总统以临时政治庇护。

60. 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力求改进其上述非正式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于1990年通过《非洲政治与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根本变化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特别保证通过建立具有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双重功能的综合常设系统和机构,以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所有争端。为体现和落实这种新思想,部长理事会于1991年核定一笔预算经费用于解决冲突,并于1992年3月在非统组织总秘书处内

设立一个冲突处理司,长期协助秘书长与各成员国协商防止和解决冲突的工作。

61. 构想的非统组织常设机构包含下列四个机关:¹⁰

(a) 秘书长办公室

秘书长办公室由总秘书处支持,预期可以通过监测潜在和可能的冲突情况,对冲突防止起一种预报系统的作用,,并成为解决冲突的调停者。预报系统将是冲突有关数据的存放处,分析这种数据将成为秘书长提交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团的建议的基础。秘书长随后将执行主席团所采取的防止和解决冲突的决定。

(b)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主席团

这个机关比现有或新提议的机关更适用,原因是它大小恰当,而且过去经验良好。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委托主席团负责处理冲突情况。主席团将代表会议,负责全面监督防止和解决冲突,并作为负责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最高机关。主席团将应主席或非统组织秘书长的请求举行会议,它将由主席和其他代表五个区域的八个成员按既定惯例组成。主席团将在会议休会期间执行其任务,尽可能做到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的会议。不然,则是部长或大使一级的会议。

(c) 防御委员会

防御委员会的实质作用主要在于通过维持和平行动解决冲突。委员会主席团预期可以提出一个可能的非洲间维持和平部队不同组成部分训练和协调的建议,以备国家一级挑选在冲突情况进行可能的部署。

(d) 临时仲裁法庭

临时仲裁法庭是在设立非洲法院之前仲裁法律性问题,例如条约解释和决定渔捞权和领土要求。

4. 中东

62. 联合国在中东有长期的作用,这个区域在战后大部分期间是冲突频仍。特别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是联合国初期就介入的领域,而且是联合国关于其领土政治方面及超越缔造和平与维持和平行动的若干决议的主体。这些决议特别申明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合法权利;以色列必须从占领领土撤军;必须保证所有国家在国际承认疆界内的安全,并阻止好战国;以色列居民点在占领的领土的活动属于非法性质;必须召开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63. 虽然很遗憾这个冲突始终没有解决,但是值得强调,从1967年以后的所有中东和平努力都还继续是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范围。而且,也值得强调,大会1991年12月11日第46/75号决议欢迎的1991年10月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已步入双边和多边轨道。与此同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观察员继续在它们所部署的黎巴嫩(联黎部队)、戈兰高地(观察员部队)和西奈沙漠(停战监督组织)防止冲突恶化方面起宝贵的作用。

64.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也已部署到本区域伊朗-科威特边界,以及最近的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许多地区。这次最近的特派团是继伊拉克于1990年8月2日侵略科威特之后,近代史上最强力使用联合国机制的直接结果。在冲突期间,安全理事会总共通过了15个决议,处理的问题如:实施强制性制裁(1990年8月6日第661(1990)号决议)、利用海空陆封锁实行这些制裁(1990年8月25日第665(1990)号决议和1990年9月25日第670(1990)号决议)以及最显著的,若科威特没有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无条件撤出科威特,核可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拥护和执行(这些决议)和恢复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1990年11月29日第678(1990)号决议)。伊拉克拒绝遵守这些决议导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它强行赶出科威特。

65. 联合国的作用在这次战争之后大为扩张。除了沿着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

非军事区部署联合国观察员部队外,安全理事会1991年4月3日通过的停火决议(第687(1991)号决议)授权联合国负责管理缴付赔偿基金,基金将从伊拉克此后的外汇收入提取。此外,按照该决议C节,联合国通过设立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检查和查封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包括现有武器囤积,以及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也负责摧毁化学和生物武器和生产能力,核实伊拉克摧毁禁止的弹道导弹,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合作摧毁、撤除或使所有核武器和核武器可使用物质变得无用。这个任务完成之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将负责此后监测和核查伊拉克是否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c节的规定¹¹。联合国参加撤除伊拉克的核、化学、生物和导弹武器的能力是联合国关于设施视察、核实是否遵守和摧毁武器的作用方面的显著努力。

66. 近年来,伊斯兰会议已在处理区域及时和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方面起了严肃的作用。该组织在解决形形色色其他区域和国际问题方面尽了外交努力。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阿富汗的局势、缅甸难民的困境等。最重要的是,它协助其会员国定期集会,对减轻猜忌和促进信任和彼此友好关系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5. 欧洲

67. 1989年欧洲转型之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于1991年6月宣布独立,处理欧洲局势的各种框架第一次受到考验。在回应这些和其他形势发展过程中,欧安会进程的参与国和欧洲共同体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调整了处理欧洲冲突的作法和机制。由《巴黎新欧洲宪章》(A/45/859,附件)建立的欧安会机构和结构在赫尔辛基得到进一步发展,以便提高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的能力。1992年7月9日至10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通过了“变化的挑战”赫尔辛基文件,加强了有常设主席的欧安会部长理事会和高级官员委员会的作用,该委员会代理理事会并设计各种方法进行协调。新设的少数民族事务高级专员的活动特别加强了欧

安会的预警作用。还通过了欧安会根据议定的模式维持和平的规定。一旦参与国内或之间发展冲突时,欧安会可以进行维持和平活动,帮助维持和平和稳定,支助一个不断进行的争取政治解决的努力。欧安会可以为此目的使用欧共体、北约和西欧联盟等现有组织的资源、经验和专长,因而可以请它们提供资源以便支持欧安会执行维持和平行动。还设立了一个欧安会安全合作讲坛,为军备控制、裁军和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进程注入新的动力,加强就安全事务的协商和合作并促进减少冲突危险的进程。这些领域进行的努力必须连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

68.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通过建立统一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加强协调一致行动能力,这项政策在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签署的政治联盟条约获得批准后即可实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过了一个新的战略概念;北约作为欧洲安全的一部分的作用得到加强。在增加了新的欧洲和欧亚伙伴的情况下通过设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北约合作理事会)建立了符合欧安会目标的合作格局。

69. 南斯拉夫的危机首次使1990年11月在巴黎并其后的6月份在柏林欧安会各种的机制可以生效。其中的一个机制涉及“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驻地之外进行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非正常军事活动”。应奥地利政府的请求,预防冲突中心协商委员会开会讨论该危机。1991年7月3日高级官员委员会也在布拉格欧安会秘书处召开紧急会议。成员国决定将寻找解决冲突办法的任务交给欧洲共同体。

70. 欧共体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1991年7月8日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会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同意接受一项由共同体提出的折衷办法,即:暂停执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宣言,尽管宣言本身没有暂停;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命令联邦武装部队返回基地;取消斯洛文尼亚民兵动员状态,并取消斯洛文尼亚对联邦武装单位的封锁;三个月冷却阶段,在这三个月内,六个共和国和二个自治省进行谈判。欧共体国家派出70名监测员监测这些条款的实施。

71. 虽然布里俄尼协定有助于减轻斯洛文尼亚的紧张局势,但并没有制止克罗地亚的战斗。在海牙召开的一次和平会议也没有能制止战斗。从1991年9月开始,欧

联合国应欧共体请求同欧共体一道积极参与为南斯拉夫危机寻求解决办法。1992年1月2日塞尔维亚政府、克罗地亚政府和联邦武装部队接受秘书长草拟的一项联合国在南斯拉夫维持和平行动计划,并同意停火。

72. 安全理事会在第743(1992)号决议中决定设立一个南斯拉夫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随后第一批维持和平单位立即到达。¹²到1992年7月,联保部队已经全面部署在克罗地亚的东部和南部沿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界地方,监测这些地区停火协定的实施情况。此外,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758(1992)和第767(1992)号决议以后,在萨拉热窝机场已经在联保部队保护下重新开放,以便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空运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决议是在地面形势恶化,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面形势恶化后通过的。与此同时,欧安会于1992年4月中宣布塞尔维亚应对南斯拉夫局势的恶化负主要责任,并警告塞尔维亚不要坚持明显、大规模违反欧安会有关承诺并不肯改正。1992年5月,因为这个原因暂停南斯拉夫参与欧安会决策进程,7月8日完全排除南斯拉夫参与任何欧安会会议。

73. 可惜,南斯拉夫形势恶化并不是欧洲所面临的唯一的严重危机。199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欧安会部长理事会会议接纳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欧安会之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同摩尔达维亚之间爆发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成了欧安会正式议程上经常讨论的议题。曾经决定1991年3月由意大利任主席在明斯克召开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平会议,但是到本研究完成之时会议还没有能召开。

C. 现有和正在出现的威胁和危险

74. 尽管在以和平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方面新近的局势令人鼓舞,许多国家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传统的威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仍然是严重的威胁。在世界许多地方,违反国际法、竞相提出领土要求、侵略行为和互相猜疑侵略意图仍然是冲突的起因。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国家获取远远超过为安全所需的合理的军事能力,又给冲突火上加油。由此引起的军备竞赛又增加了互相怀疑,这样就减少了所有国

家安全。在国家内的种族、民族、文化或宗教差异也可以增加对安全的威胁,造成爆发武力行动并影响国内外。

75. 除了这些对安全的传统的军事威胁之外,对个人、社会、国家和全球安全的非军事威胁也日渐增多,上文第一章已经谈到。

三、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实质和主要特征

76. 个别和集体自卫权利使得在当代世界上维持武装部队合法化。各国政府可以以防御名义增加部队、建立武器系统和使用武装部队。但是,在两个对立的国家可能根据防御条件来调整各自的军备状况时,它们很可能将对方的准备看成是具有侵略或进攻意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断定那些军事姿态和活动更具有防御性,那些更具有进攻性?

77. 过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曾经做过多次尝试寻找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标准,区别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战略和力量。这些尝试都基于下列假定,即防御作为一个目标和作为一个军事行动之间具有密切联系。¹³

78. 1932年至1934年,由国联主持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期间,第一次作出重大努力来确定区分进攻性和防御性能力的明确标准。这次会议的目标尤其是要实现质量裁军,会议总务委员会对质量裁军的定义是“选定某些级。或类的武器,应绝对禁止所有国家拥有或使用,或由一项普遍公约使之国际化”。裁军目的的定义是:

“由主管的特别委员会对陆地、海洋和空中军备的射程进行审查,目的是选出最具有攻击性的或反对国家防御效率最高的、或最具威胁平民特性的武器。”¹⁴

会议的三个特别委员会没有能就什么构成“进攻性”武器达成统一定义的原因各式各样。一个原因是没有将使用这些武器放在具体环境中考虑本身就难以规定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定义。

79. 1980年代初期开始,西欧的和平研究人员拟定了具体模型旨在强调“防御性”而不强调“进攻性”能力,以便在整个欧洲消除军事力量的“进攻性”姿态。这些努力中产生的术语和基本假设为苏联所采用。从1986年开始从戈尔巴乔夫总统直到下面的苏联官员都宣布打算将苏联军事理论改向“防御性”,包括防御的“合理充足数量”观念基础上的力量姿态。

80. 加上上文第二章讨论的东西方关系的改善,这些形势发展进一步促成了下列构想,即可以通过更加强调各国军事力量姿态的防御性方向来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加强国际安全。本章审查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支持这一提议的主要构想。

A. 各种研究报告的调查

81. 本节的目的仅是为了概述主张“非攻击性防御”者的主要假设、论据和结论,以期确定它们对我们整个研究工作的价值。

82. 1980年代中出现了许多词语用以叙述那些强调必须着重防御的各种模式、概念、观念和定理。这些词语包括“非攻击性的防御”、“非挑衅性的防御”、“防御性的防卫”、“防御性优势”、“在结构上无力攻击”、“合理的能力”等等。虽然这些词语每一个都可以由不同的人士以具体但却稍有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可是,它们全都基于类似的构想。

83. “合理的能力”概念最初是在1970年代初期的北约和华沙条约成员国间的共同均衡裁减军事力量会谈上提出的。苏联在1980年代中期再度采用此一用语来形容被视为足以实现新苏联军事思潮的各项防御目标的实力水平。1987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此一概念界定如下:

“我们认为确保合理的能力方式如下:各国均不应拥有超出为有效防御所必需的水平之外的军事部队和军备;而且亦认为:各国的军事部队在结构上将能提供一切必要手段来击退可能的侵略,但同时亦使其手段无法用于展开攻击性的任务。”¹⁵

84. 苏联的军事思潮具有政治方面,亦具有军事与技术方面。前者涉及国家的一般安全目标。这些目标一向都称为纯防御性质者。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期至末期宣布了一种新的理论之后,苏联军事思想中的军事与技术内容才强调最有利于实现这些防御目标的办法乃是通过以“合理的能力”概念为基础的防御性战略。因此,在1990年底发布的苏联军事学说草稿声称,在常规部队方面的能力应包括“为确保可靠的防御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数量,但却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行动”¹⁶

85. 强调维持“为确保可靠的防御所必需的”最起码的数量正突出了一个观点,即“合理的能力”概念所规定的实力水平必须联系到可能的敌对方所拥有的实力水平。因此,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曾在1987年声称,“军事和战略均衡状态……对预防战争而言仍具关键性作用。”¹⁷同时,“合理的能力”概念还强调必须确保应以逐渐降低军力水平的方式来实现军力均衡状态。

86. 前苏联的领土上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后,其成员中的六个——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于1992年5月在塔什干举行的独联体会议上缔结了一件集体安全条约。它们宣称,它们的军事理论是朝向防御的。这些国家中具有最强大军事潜力的俄罗斯曾宣布,它的国家军事理论基础乃是充分防御能力原则,其定义经1992年5月的俄罗斯军事理论草稿界定为:

“国家(国家集团)的武装部队的势态已足够预防和抑制假想敌的侵略,但却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除非另外增加部队(武力)和其他措施,以增强它的战斗潜力。”¹⁸

87. “非攻击性的防御”是指着重防御能力但却规避拥有攻击能力或挑衅能力的一种军事姿态。本概念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却均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主张应赞同“非攻击性的防御”论的荷兰人、挪威人和德国人曾分别提议三个特别简洁的定义如下:

“一种军事姿态,其武装部队的战略和作战概念、部署、组织军备、通讯

和指挥、后勤和训练都显示它们完全是明确具备充足的常规防御能力,但却明确地没有能力进行越界攻击,不论是对敌对国的领土入侵或是毁灭性的攻击。”¹⁹

“一种不威胁敌对国家本国领域,但亦不致因为先发制人的攻击而遭到毁灭的结构;它还拥有能够成功地阻止敌对国攻入防御国的合理的能力并且在击退入侵的过程中对本国社会造成最轻微的损害。”²⁰

“武装部队的建立、训练、后勤和理论均完全被视为不适于攻击,但却明显地足以进行可靠的传统防御。”²¹

88. 这些说法显示,“非攻击性的防御”概念的维护者们都强调将一国的武装部队结构保持在明确的仅具防御性质的重要性。这点应反映在指导军事行动的战略一级的理论或战略概念以及如何部署、训练、装备、支援和指挥武装部队。尤其是,持此类论点的人都坚持,指导军事作战和武装部队的战略概念虽然规定必须能实施有效的防御,可是却同时必须强调该国应无能力威胁到另一国领土。

89. 在欧洲出现的“非攻击性的防御”的各种细致的模式虽然在某些内容上有所不同,可是却都是基于一种中枢信念,即其主张者都认为,建立在“攻击乃是最佳的防御方式”的假设上的军事姿态本身就会破坏稳定,因为用来执行这些攻击性战略的武力类型与为公然进行侵略所需要的武力是相同的。一国武装部队事实上强调攻击能力并不当然反映出它怀有针对邻国的敌视意图;可是,由于具有发动大规模攻击或入侵的能力的潜在威胁会引起恐惧和猜疑,可能进而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如果还错误理解他国意图,那么,就可能会因为估计错误而引发战争,从而损及以政治手腕设法解决国际危机的机制。

90. “非攻击性的防御”原则乃是为了避免此两难困局。如果能够精心设计将防御政策中的“威胁因素”减至最低限度,那么,“非攻击性的防御”姿态就是为了想要使维持充分的可靠的防御目标同建立信心和放松政治紧张情势目标之间取得调和。

91. “有关非攻击性的防御”概念的讨论和确立模式研究工作主要都涉及东方-西方范畴内的种种问题。相应的提议主要都出现在军事力量集结和核升级危险最明显的国家;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是,它们并不能够确立取代已正式做好的部署的实际替代行动,也未曾提供综合性实际解决办法。不过,德国以及后来的丹麦、波兰、荷兰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主张应赞同“非攻击性的防御”概念的人士的确已有助于一些人在苏联和其他国家鼓吹“防御性的能力”和“合理的能力”的核心想法。

92. “非攻击性的防御”各种模式的细节内容虽然各不相同,可是,其拥护者们却都同意三项基本假设:

- (a) 重装甲部队,尤其是如果部署在前方集结地区者,都具有潜在的攻击性质和挑衅性质,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火力和防护能力;
- (b) 关键性军事实力的脆弱性可能导致敌对方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 (c) 威胁到敌对方国领土完整的军事力量都具有挑衅作用。

93. 所提出的用以克服军事力量结构中这些潜在的挑衅因素的特殊模式可以分为四类,而每一类都代表一种不同的防御概念:即区域防御;大面积范畴防御;火力阻挡防御;以及综合性互动的前沿防御。²²以下为这些模式的简短实例说明;

(a) 区域防御: 区域防御的主要目标乃是利用消耗战的方式,使侵略者不可能打赢决定性的战斗。此一模式包含部署由小规模机动武装单位组成的驻扎在整个防卫地区各地的所谓的“技术性突击队伍”,但不包括那些将会用非暴力方法进行战斗的人口密集的地方。每一个此类队伍应负责防卫大约10至15平方公里面积的陆地。这些单位的装备包括有高科技地雷、有引导的反坦克武器和火箭,用以攻击大量集结于攻击突破点前沿一带的装甲部队。这些单位还将获得炮兵火网的支援,以集中火力打击前进中的装甲部队;它们进而还有传统的装甲部队的支援,以对付可能突破而入的侵略者部队。

(b) 大面积范畴防御: 此一模式将防卫力量区分为两类——即“盾”和“剑”。

“盾”武力由轻步兵旅和团组成,部署在纵深大约为75公里的边界地区。它们的任务将是摧毁进攻部队并且利用有利防御的山地地形特征来诱使入侵敌方力量误入由“剑”武力可提供集中火力加以打击的阵地。部署在后方的“剑”武力包括传统的装甲旅部队,足以集中火力打击侵略者前进中的坦克部队。

(c) 火力阻挡防御: 火力阻挡模式预期的是一种分层次的防御。第一层为一堵火墙——即如果侵入,就会遭到充满各处的遥控地雷、飞弹和火箭攻击的边界内的狭小地带(纵深大约为五公里)。在火墙后方紧邻的是小单位轻步兵部队所配备的导向武器,用以对付侵略者任何攻入的企图。番号较少、但更重的装甲兵部队为了支援以上的二层次防御应有能力对付已经突破以上头两个层次的防御系统的入侵部队。最后,其后方的国土防御单位的作战应具有民兵部队防御战力。

(d) 综合性互动的前沿防御: 此一模式亦称为“网与蜘蛛”模式,因为防御国将利用军力设法打击“昆虫”即攻入者至精疲力竭并加以围困。“蜘蛛网”包含几支小部队单位,每个部队都负责应防卫某一指定的地区,其防卫武器包括地雷、反坦克炮和短距离非直接发射的武器。这些防御火网部队负有四项任务:拖住和消耗侵略部队;向“蜘蛛”部队提供通讯联系和情报;向“蜘蛛”部队提供火力和电子战掩护;向“蜘蛛”部队提供后勤支援。数目较少的“蜘蛛”部队由可以在“蜘蛛网”上到处活动的机动部队组成,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用于战术反攻的突击部队;二是由轻装甲车辆载运的步兵;三是反坦克骑兵。它们的任务乃是:同网内各单位合作拖住、引诱和消灭来犯敌人;执行阻挡任务;对已渗过防线的入侵敌人进行反击;必要时支援网内各单位。因此,本模式容许某种程度的反击能力,但却在实际上局限于“蜘蛛”不可能离开“蜘蛛网”或防御区域。

94. 虽然有关“非攻击性的防御”的种种提议和模式都起源于欧洲,可是,有许多现行有效的有关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及政府间宣言由于规定应消除在某一区域或某一地区的某些或全部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以均得视为支持“非攻击性的防御”概念。这些条约和宣言特别包括下列的实例:《南极条约》(1959年);《关

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1967年);《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及《第一号和第二号附加议定书》(1967年);《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1971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1972年);《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1985年);《阿根廷和巴西关于核能仅用于和平用途的协定》(1991年);《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门多萨协议》(1991年);《非洲非核化宣言》(1964年);《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区与合作区的宣言》(1986年);和《关于放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卡塔赫纳宣言》(1991年)。

95. 此外,有关针对裁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安排的种种构想和建议已在各个地区出现过;如能实现,就可以促进为实行防御性安全概念创造条件。此类建议特别包括:1974年伊朗和埃及建议应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提议;1983年印度尼西亚提议通过在东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来促进1971年东南亚国家联盟宣布该区域为和平区、自由区和中立区的宣言的提案;1988年印度所提议的关于设法实现无核武器的无暴力世界秩序的行动计划,以期分阶段地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将常规部队减少至为防御所需最少水平以及能够建立综合性全球安全体系的世界的提案;1990年埃及提议的关于在中东建立无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域的提案;1991年巴基斯坦提议的关于召开印度、巴基斯坦、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会议以讨论南亚的核扩散问题,以期达成关于在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协定的提案;1991年洪都拉斯所建议的《中美洲安全条约》草案要求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该承诺不取得、不维持、不准许在其境内安置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B. 防御性安全

96. 上文第12段界定的“防御性安全”超越了那些较有限的概念,象前文所述的“非攻击性防卫”和“合理的足够防卫”。这个概念涵盖了政治部分和军事部分,其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推行政策,采取既能确保有效防御,对

其他国家又不构成威胁的有效防卫军事态势和军力。然而,必须强调防卫安全政策的方式在实际上取决于某一区域当其时的安全情况以及有关国家在这方面的观念。

1. “防御性安全”的目的

97. “防御性安全”的目的是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世界上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条件。

98. “防御性安全”的概念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防御性安全”能否实现取决于创造必要的政治和军事条件,通过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转变,消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以致每个国家均感安全,不受外界军事威胁。

99. “防御性安全”的概念与集体安全的概念是相关的这涵蕴了各国安全是不可分的,即在某一集团或区域之内每一国家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是相连在一起的。关于集体安全的上述原则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之上的:

- (a) 所有国家均有享有安全的合法权利;
- (b) 军事力量不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合法手段;
- (c) 在表达国家政策时其方式必须有所克制。

集体安全的概念还涵蕴了以下两个结论:

(a) 对军事优势的追求(这是军备竞赛的一个因素)是不能保证安全的,而且这显然与集体安全概念有抵触;

(b) 必须在集体安全的范围内裁减军备,这才能确保互信和安定等必要条件。

100. 为此目的,有必要通过协作对话、采用建立互信措施、逐渐开始改变军队态势以及裁减军备数量,促进对各国安全不可分的认识。

101. 重要的是,着重指出实现“防御性安全”在每一情况下都要求特定的态度。指导性原则是国家以不减损其他国家安全的方式来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而实现本国的国家安全。为此目的,必须采取实际政治和军事步骤,这些步骤一旦执行,将反映出对“防御性安全”概念的承诺。

102. 这些政治和军事步骤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向其他国家保证本国的和平意图,表达其对各国安全不可分的承诺这意味着推进这个目标,是对国际法的尊重以及对政治和军事事务透明的承诺。这些考虑的目的旨在重新向其他国家保证,在维持保卫本国安全的能力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安全作出承诺。

2. 政治考虑

103. “防御性安全”的最重要政治条件是承诺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各项规定,并且依照国际法行事。按照定义,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便是不拥护“防御性安全”的原则。为了取信起见,它们就国家对外合法行为发表意向声明以外,必须继以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步骤,显示出它们意图遵守国际法原则和拥护《联合国宪章》。

104. 实施“防御性安全”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各国之间存在其正式它们所以为的利益冲突。因此,主要的政治先决条件是使各国间政治关系改善,并且减少紧张关系,拥护国际法和消除侵略。

105. 和平解决争端有助于改善敌对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一个基本属于政治性的进程。通过致力于按照国际法原则解决冲突的进程,可化解分歧。循着解决国际争端的工作,联合国在这个进程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106. 开放的政治制度,例如民主,比起封闭的政治制度,要有助于减少互不信任的工作。一国的政制开放固然不能保证该国就无侵略的意图,但是此等意图一旦作为官方政策发布,在开放政制下总会引起公开辩论,有人便会对此等意图提出质疑。政策的骤变证明是较难执行的。此外,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开放政制可有效防止政府暗中行动的倾向。因为暗中行动导致其他国家对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生疑,一个使政府打消暗中制定政策的政制为减少怀疑和恐惧提供了条件。

107.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由合法政治当局设计和控制防卫政策。军事组织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密和暗中进行。然而,为了促进合法的控制,关于军事问题的资料必

须流通,并且向合法的政治当局提供。政治控制涵蕴了威胁和国家利益的确定,战略概念的制定和武器采购的决定应是一国合法政治当局的主要责任。军方的任务乃是就这些问题向合法政治当局提供意见,并且以符合其指示的方式执行后者的决定。

108. 此外,政治控制也涵蕴在管理和行政各级,以及在整个公民社会中,促进文职人员和平民掌握对军事问题的专门知识。这对目前从军事统治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尤其重要。有政党的专家和公民社会参与的关于防卫和安全问题的公开辩论,往往能为政府不会选择推行侵略政策提供双重保证。

109. 应当着重指出,公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做到公开,的确需要互惠。此外,一国面对的安全情况也可能影响到该国认为可以开放的程度。在尖锐冲突的情况下,即使公开的政治制度也往往会限制可自由获得资料的程度;封闭社会几乎不面对什么公开化的诱因。

110. 一国的民主政制本身也许不一定能保证该国不会推行侵略政策,它决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将该国的政策看作威胁性或挑衅性的。单单宣布不侵略或和平意图并不能保证安全和稳定,即使在一个公开的社会,这些意图较易评估。虽然意图在短期内可变更,军事能力却无法在短期内出现变化。因此,为了真正取信于人,使人放心和起安定作用,在就防卫意图作出政治性宣布时在物质方面;即军队的组成、培训、装备、组织和部署,应有相应的表现。

3. 军事考虑

111. 军事考虑有两个因素:战略性概念规定了军队的任务及其态势;后者提供物资能力以执行概念的内容。为了强化关于“防御性安全”的前景,战略性概念和军队态势应强调“防御性”多于“攻击性”能力。²³其有效性取决于无论双边或多边在执行时是否互惠。

112. 下文所述的军事考虑特别适用于国与国在敌对的处境下互相对峙的双边情况。此外,如果没有政治分歧,一国不一定认为有必要采取此处详述的军队态势,因

为该国不必担心受攻击,关于其他因素,诸如将盟国卷入纷争,某些武器系统(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所发挥的作用,的讨论见第四章。

(a) 战略概念

113. 卡尔·冯克劳斯威茨在阐述时防御说: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挡开一下打击。防御的特征是什么?等待打击。使任何战事变为防御战的正是这项特征;这是使防御战争有别于攻击战争的唯一考验”²⁴

对于这项陈述,最重要的是,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空间系指防御行动的地区;时间系指军事行动或回应的发起。两者结合在一起,界定了防卫性战略概念的本质。

114. 以保护和保全某一空间免受攻击为目标所传达的概念是防御性战略概念。空间通常系一国的国家领土或盟国领土、在这方面,防御性战略概念的目标是保护国家或盟国领土,如果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则恢复原来的状况。因此,拥有占领外国领土的能力与“防御安全”的情况是有抵触的。

115. 防御战略概念的第二个极重要的因素涉及时间。除了继续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以外,向其他国家承认本国有使用武器的主动性的战略概念也可视为防御性。诸如率先或防范性攻击的概念与防御性战略概念是有抵触的。强调率先攻击,他方自然视之为攻击性,导致该他方害怕受到攻击,也许会在一方未发动攻击以前,便先行下手。因此,防御性战略概念意味着除非一国的重大利益被侵犯,否则不能发动战斗。不过,任何回应的程度必须与攻击的程度相称。

116. 为使可能的敌国认为可信而有效,一个防御性战略概念必须反映在由一国支配的军队支持关于传达防御性概念的目标。如前文关于率先攻击的例子显示,倘若所部署的军队拥有大规模攻击或侵略性行动的能力,单单声明其目标是防卫领土和“打算等候攻击”不足以取信于人。因此,如果一个防御性概念反映在武装部队的态势,则其效果是最能使人安心的。

(b) 部队姿态

117. 正确了解的战略概念将对武装部队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如何组织,部署,配备和使用作出规定。因此它的防御性的倾向应该反映在整个部队的姿态上,而不一定要反映在构成整个战略作业的个别能力和战术考虑上。我们一旦考虑到军事作业的性质,为什么会这样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在指挥的作业和战术层面上,(即军团和师和以下各级),攻击和防御的考虑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而已。就象第四章将要详细讨论的,这方面有若干理由,其中有两个较为突出。第一,如果只是要收回初次攻击时失去的领土,有效的防御就需要采取攻击性的行动。其次,如果我们审查某特定武器系统或个别的军事组成,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对防御性的目的和攻击性的目的加以区分。任何武器系统都可以用来达到攻击性和防御性的目的;任何军事组成,不论其配备如何,在原则上都有能力进行攻击性的行动。

118. 区分面向攻击和面向防御的地面部队上的困难在海军部队方面将变得更复杂,因为陆上战争和海上战争存在着根本的差别。陆上战争行动多半集中在领土的实际取得和占领或防止它们被占领,而海上战争多半在于要能够无害进出或通过国际水域。一般而言,海洋被用来作为通讯的工具,用来进行贸易和商业,向冲突地区运输部队,用品和设备用来达到其他和平和非和平的目的。除了少数例外,取得无害进出和通过海洋的手段可以被用来达到攻击和防御两方面的目的,即阻止他人进出或使自己得以进出。因为防御的概念一般是指保持领土的完整,把这种概念用到海军部队上必然会遇到困难。虽然在地上部队方面仍有困难,但以下所说的防御部队的姿态主要是指这些部队。

119. 地面部队姿态的倾向应该通过审查整个部队的姿态来加以评价。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主要注意指挥的战略层面。至少有四个因素可以多少显示出部队姿态的倾向。它们是,在整个部队当中发动进攻和大规模攻击行动所必须具备的军事能力的和不是这方面所必须具备的军事能力之间的分配情况;在防御的领土内部的部

署形态和这些部队的机动情况;军事设备和人员的备战状态;维持军事行动所必须的后勤和指挥和控制的能力。促进“防御性安全”就必须减少或尽量缩小军事部队姿态中所有这些因素的攻击性的特征。

120. 如果减少了侵略的能力,部队姿态的防御倾向就会被加强。这种能力的核心是产生足够的冲击力使它们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行动的能力。战略冲击力是高度的机动性,火力,技术先进的武器和维持长距离的攻击行动的能力的组合。战场坦克,装甲作战车辆,大型炮弹系统,作战用飞机和攻击性直升机等是能够产生战略冲击力的部队的典型例子。

121. 例如,裁减这些武器系统是《欧洲常规武器部队条约》的核心。这些裁减的目的是限制一个国家集团产生进行大规模攻击性行动所需的战略冲击力的相对能力。但是,不象主张“非攻击性防御”的人提出的概念,它的目标不是要消除这些能力。条约各方清楚了解,行动一级的攻击性能力仍然是达到防御性目标所必须的,包括使它们能够收回失去的领土和对突破的企图进行反击。

122. 它们没有试图彻底消除那些生产战略冲击力所必须的系统,而是部队姿态应该在较低部队水平的军事行动和军备之间,以及在攻击性和防御性能力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在战术和行动一级上保持某种采取攻击性行动的能力对于有效的防御来说仍然是必要的。但在保持这种能力的同时应该更强调反击攻击性行动所必须的那些武器系统(象反坦克弹药,防空系统和地雷)。显示出某一个部队姿态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是这些能力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绝对水平。同时,就象《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所突出的,还必须确保在两个国家或联盟之间,在产生战略冲击力所必须的能力上达到适当的平衡。

123. 第二个问题牵涉到部队是如何部署的。为了发动攻击,一般必须沿着关键的攻击轴线集中机动性高火力强的地面部队。同其他支持攻击的特征一道,这种能力可以显示出攻击性的倾向。为了表达防御性的倾向,沿着边界部署的部队应该比较固定和不活跃的,而把机动性比较高的增援部队放在后方。同样地,把比较机动

的部队放在后方,在出现敌对情势之前把这些部队移到边界就会使可能的敌对者得到警告。同时,在初步防御部队无法制止任何突破的企图时,增援部队将可以提供必要的能力来对抗那些企图。

124. 在许多情况下,现役和后备部队的高度备战状态也可以显示出攻击性的倾向。如果边界或边界附近部署的部队处于高度的备战状态,能够迅速进行同它面临的危险不相称的军事行动,这就可能是攻击性的倾向的一种表示。除此之外,如果后备部队可以迅速动员起来,使一国的战时军力可以迅速得到扩大,这可能是攻击倾向的第二种表示。最后,如果一国试图积极隐瞒它调动部队的努力,它就很有可能在酝酿发动出其不意的突击,而人们普遍相信,出其不意是攻击行动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不过,迅速动员后备部队和出其不意同样也是成功的防御的特征,因此我们只能从各种不同因素的组合才能清楚看出更具攻击性还是更具防御性的倾向。

125. 一般来说,现役部队的备战状态低(只依赖现役部队部分人员),高度依赖后备部队的动员他们(一般是训练较少的),决心在军事准备工作上,特别是包括部队的行动和动员方面,做到公开和透明等因素的组合可以比较清楚的显示出一国部队姿态的防御性倾向。

126. 对于确定一国部队姿态倾向十分关键的最后一个因素是维持军事行动方面可以得到的后勤支助的水平。当然,攻击和防御都需要后勤支助来维持它们的行动,直到达到目标为止。因此,生产问题的不是军事必需品,譬如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等储存量。区分攻击和防御倾向的是,它是否拥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维持军事行动的后勤组织。如果在前方储存了大量燃料和弹药并且拥有运输它们的大量能力,我们就可以假定它们有攻击的意图。相反,物资支助的储存比较固定和退缩的就表现出一种防御性的倾向。

127. 有关防御性部队姿态的部队训练水平,使用后备和后勤支助方面的建议显然不适用于部队完全由职业军人组成,因此必然维持高度备战状态的国家,或不适用于随时准备进行紧急任务的情况(包括集体安全行动和援助盟邦的行动)。

128. 这些部队姿态的问题也应该反映在一国技术改进,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做法和采购工作上。就新的技术而言,它们应该以提高部队姿态的防御性质为目的,但应铭记着对它们作出区分是很困难的。新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采购和转让应该尽可能做到透明,并以增强防御性能力而不是攻击能力为焦点。

129. 总之,军事部队姿态一般有助于“防御性安全”目标的达成,如果:在取得和保持领土所必须的能力和防止它国这种企图所必须的能力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前方部署的是军备较轻机动性较低部队,而重型军备和机动部队则部署在不会为先发制人的攻击所乘的后方战略地点;现役部队只配置部分人员,依靠动员后备部队来达到作战状态;别国可以随时观察到它的军事行动和部队的移动;作战行动的后勤支助可以集中在受到防御的领土内。

130. 对于以这种方式编制的武装部队的防御倾向的信心将会增加,如果指派给它们的任务和冲突中它们实际的参与情况长时间以来都反映出了这种倾向。即使它的结构符合防御的路线,一个一再从事攻击任务的军事部队也不会被认为是防御性的。因此,长时间以来部队的任务和它的实践应该反映出战略构想和部队姿态的防御倾向。

四、实施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问题

131. “防御性安全”的实施面对若干实际问题。这包括区别“防御性”和“攻击性”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固有困难;任何国家如果希望维持其领土完整,就需要在战术和作战上保持进行反攻的能力;而集体自卫的权利(不管是否建立在正式的联盟承诺上)暗示军事能力需要伸展到特定国家的领土以外。

132. 除了这些实际问题之外,“防御性安全”因国际关系上持续的紧张和冲突而变得更为困难。虽然军事能力方面强调防御取向所形成的信心可能对冲突形势的性质产生有益的影响,“防御性安全”概念的全面实施最终视各国的安全感而定。因此,国家间改善政治关系和营造互相信任感是成功实施“防御性安全”的一项先

决条件。不过,在分析促进改善关系的实际措施之前,必须详细描述实施“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A. 武器系统

133. 武器和武器系统的特性给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有效实施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很难区分“攻击性”和“防御性”武器和武器系统。其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给“防御性安全”的实施提出特殊的难题。在第一个问题上和甚至某种程度在第二个问题上,武器的防御性作用只能在其使用范围内加以决定。然而,从定义上说,具体情况决定武器的使用范围,因此不可能拟定普遍适用的指导方针。

134. 大部分关于“非攻击性防御”的文献假定,在“攻击性”和“防御性”武器之间可以作出明确的区分。不过,实际经验表明,这项假设是不适当的,或至少需要作出保留的。例如,反坦克武器可以用来延迟和摧毁前进中的装甲攻击或逐出深挖战壕的防御力量。甚至剑和盾这样的典型“攻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作用也是模棱两可的。剑可以用来挡开攻击性的冲刺。相反地,盾的有效使用能够搞掉对手的剑,和其后用来压倒对手。由此可知,“武器的攻击或防御性同等地取决于其使用的全部内容及其固有特性。甚至如下棋,同样的一些棋子可以用来从事防御性或攻击性的游戏”。²⁶

135. 虽然常规武器在不规定可能使用范围下一般无法加以分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划分却并非如此。尽管1930年代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在明确鉴定什么是攻击性武器方面完全失败,但对什么武器应该被认为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却达成了协议。²⁶ 联合国常规军备委员会在1948年8月12日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该定义为包括原子弹、放射性材料武器、致命的化学和生物武器,和将来研制的具有同原子弹或上述其他武器相类似毁灭作用的任何武器。²⁷

136. 虽然这些武器没有被确定为“攻击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给防御取向造

成严重的挑战。世界社会对于这一点达成广泛的协议。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1972年,《生物和毒性武器公约》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性武器。1989年1月,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会议期间,149个国家呼吁早日缔结一项关于完全和有效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在日内瓦谈判下摧毁这些武器的公约(见A/44/88,附件)。因此,国际社会一致承认消除化学和生物武器的迫切性。就此而论,这些武器的拥有和使用是同“防御性安全”概念不一致的。

137. 核武器引起稍为不同的问题。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认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并答允进行“诚意谈判,订定关于早日停止核武器竞赛与关于核裁军之有效措施,以及在严格有效国际管制下普遍彻底裁军之条约”(A/RES/2373 (XXII),附件,第六条)。

138. 1978年6月30日(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重申了这个目标:

“至为重要的是在一切方面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以便避免发生核子武器的战争危险。这方面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子武器”(见第S-10/2号决议,第47段)。这份文件也载有如下的声明:

“核子裁军的过程需要采取一些措施,确保通过逐渐降低核子军备水平来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考虑到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现有武库的比较、质和量的重要性”(《同上》,第49段)。

139. 这些和其他声明认识到进一步的核子裁军措施是一个渐进过程,应该在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努力的框架下进行。在东—西关系的范围内,军备竞赛已经结束和扭转。在这方面,1991年7月苏联和美国之间签署的《裁减和限制战略攻击性军备条约》,以及1992年6月17日缔定新的《布什—叶利钦战略核子弹头协定》是重要的步骤。这些和已经宣布的其他核子武库部门的进一步裁减必须加以落实。

B. 攻击和反攻能力

140. 军事政策上实行面向防御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效的防御可能需要有采取攻击行动的能力。在战术和作战一级上,这种能力是有效防御所必要的。这样做的最明显的理由是,防卫者需要夺回丧失给侵略者的领土。但是,可以设想出其他情况,攻击性行动是达成防御性目标的关键。海湾战争提供这样的例子。为了解放科威特,联合部队必须发动攻击性行动来把伊拉克占领部队驱逐出境。虽然该项军事行动显然属攻击性,但其目的-恢复科威特的主权-正好的“防御性安全”概念认为是合法的那种防御性目标。

141. 一种剥夺防卫者在战术和作战一级采取攻击性行动的武力态势因此可能证明是无效的,从而使这种态势失去可信性。正是这种常常被主张“非攻击性防御”者鄙视的机动性是这种能力的关键。此外,在某些情况下,机动性对防御者有利多过于对攻击者。例如,在最初的突破战争里,攻击者只要能够对防御者隐蔽其行动,获得出其不意的效果不需要有高度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被突袭的防御者需要有迅速调动部队的机动性来在突破点应战攻击者,以便达到目标。²⁸

142. 如果有效反攻能力的武力态势特点类似于攻击的武力态势,则很难区别防御和攻击性取向。采取上面第三章讨论的对称武力态势特点作为基础能够减少这种对实施“防御性安全”的挑战。因此,在武力态势中可以作出减少采取大规模攻击性行动能力的机动和固定能力分布,原则上可以采取攻击性行动的机动部队可以驻扎在后方;和平时期机动部队的战备可以维持在低于战争时期的水平;而后勤支助能力则可以部署在远离边界的地方。

C. 一些国家的集体防御和联合承诺

143. 为“非攻击性防御”观点所固有的防御性军事力量态势概念通常假定所有国家的主要关切局限于捍卫本国的领土。这在一般意义上当然确实如此;《联合国

宪章》规定武力的合法使用只限于自卫。此外,《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也表明各国行使集体自卫的固有权,这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各国在面对侵略威胁或实际侵略时保持其领土完整的唯一有效方法。

144. 集体自卫权利意味着各国必须有援助侵略受害者的能力。在一些情况下,这可能暗示至少一些国家个别或集体地必须拥有把军事力量投射到其本国边界以外的能力。按照定义,这种能力给这些国家提供采取攻击行动的潜力。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应该只拥有足以捍卫本国领土的武装力量的观点可能有问题。这些能力的拥有和其后的使用应该仅仅为了按照《联合国宪章》各项有关规定而实施集体自卫目的,因此不应该被看作为对邻国构成威胁。

145.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于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正式联盟承诺,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同一区域。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在过去,并且很可能在将来继续设法通过缔定以集体防御为目的的正式军事联盟来保护其安全。这些联盟通常反映-往往具有一种共同价值感-那些在互相援助制度提供的保护中寻求安全的成员国对其利益有一种共同的受威胁感。不过,这种保护取决于能够捍卫其盟国利益的国家。如果这些盟国认为这种能力给它们的利益提供可信赖的保护,它们很可能准备采取或维持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态势。

146.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安全联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²⁹ 根据历史和宪法理由,日本制定明显地属于防御性质的军事学说和武力态势。这种“专门防御取向”的政策反映于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不拥有为对敌人领土造成巨大破坏所必需的长程导弹、战略轰炸机和航空母舰;它将不拥有、生产、或允许把核子武器引进其领土;它将不让其部队在其领土以外从事作战行动;并且将会把其军事行动限制在日本的直接领土、海洋和空间。这些突出防御取向的观点可以按照在具体情况下引申的不同标准来得到表达。

147. 不过,日本认识到它的军事能力也许不足以应付对其领土的攻击,因此依赖美国保护它免受核子攻击和为了保护其领土而进行任何必要攻击行动。日本采取

防御性态势的能力因此关键地依靠美国作出的承诺,即美国在日本军力证明无法捍卫其利益的时候承担防卫日本的责任。

148. 法国及其非洲盟国之间的相互防卫协定是另一个例子。这些协定载有相互军事援助的重要规定,并且通过双边和集体协定来予以加强。凭着法国的军事保护,一些西非国家采取了防御性军事态势,在防卫方面普遍减少开支。这些例子表明,某些国家真正有效的防御性军事态势取决于其盟国的军事能力。不过,这些协定导致在有关区域内适度的军备竞赛,尤其是由那些不是协定成员国的邻国所进行的。

149. 任务专门化构想是一项针对这些困难而提出的建议。关于这个构想,专家组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其实施也许会有严重的实际问题。根据这个想法,某集团内的国家将个别地专门发展不同的军事投射力量-例如,空运、海运、后勤支助、装甲战争、纵深打击能力等等。虽然这个集团内没有一个国家会拥有独立投射全部武力的能力,国家集团会合起来的武力足以在有关国家领土外进行集体行动。就这样,任务专门化在可行情况下提供采取集体行动的足够军事能力,而不会同时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实际或意识到的威胁。

D. 双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适用性

150. 同在军事力量态势方面实施防御取向的这些固有困难完全无关的,“防御性安全”概念的实施有若干实际的障碍。其中一个,是国家间或区域内的紧张或冲突如此严重以致有关国家不可能采取防御性安全政策。导致发展攻击性军事态势潜力的不安全感往往是关于领土、意识形态倾向或历史经验的真正利害差别,或力量差别的结果。在这种认识下,只要没有保证其潜在的对手将会跟着做,这些国家不大可能踏上减少其军事潜力的途径。

151. 因此,在冲突频仍的区域里,可能需要有一个旨在减少利益分歧和不信任程度的政治过程来实现必要的军事变化。正如在第五章上进一步讨论的,这项过程可

以包括在对等基础上采取建立信任和增加透明度的措施。在这类区域里实施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全部过程可能从政治或军事方面开始或两者配合起来。重要的是区域各国作出开始这一个过程的承诺,并且认识到政治和军事两要素必须串联在一起。

152. 力量和大小的差距也可能给防御性安全政策的实施带来问题。一个强大国家的军事态势甚至如果被减少和属于防御性,也可能对力量薄弱的邻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在这些情况下,发展和保存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安全的最佳保证。

153. 在具体的双边和区域环境下,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适用性的每一项挑战都突出政治因素对成功落实防御性安全概念的重要性。在缺乏基本程度的互相信任下,仅仅改变军事力量的部署和能力将证明不足以导致所需的变化。当然,减少军事力量的攻击性或挑衅性可能是旨在改善政治关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如果没有旨在解决真正分歧和改变关于对外意图的错误认识的积极外交活动,仅仅改变军事结构将会证明是不足够的。

五、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战略和措施

154. 在国际关系中采用“防御性安全”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实现需要采取逐步的方式进行。在实现的方法和期限方面可能会因区域的不同和因各国双边或多边关系的不同而异,而尽管实质方面可能不一定如此。在某些区域,在转变国际关系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因此根据“防御性安全”的原则建立一个合作安全体系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但是,在许多区域,基本冲突仍连续不断,尽管人们为了实现“防御性安全”已在采取某些初步的步骤。

155. 由于必须考虑到区域不同,在全球层面上没有一项普遍适用的旨在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战略。与此同时,又存在着某些可以更广泛适用的措施,即使其细节仍将因区域不同而异。例如,《联合国宪章》所载集体安全的各项原则的普遍性为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战略提供了一项基本成分。同样,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可

以减少秘密和猜疑,并建立必要的相互信任,促使各国确信可以采取更加着眼于防御的军事态度。对军事活动和所拥有军事设备的限制也将构成改革一国的武装部队和使之成为防御性结构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最后,充分和有效地核查国际义务的遵守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为了确保遵守情况,也是为了增进相互信任以致各国将继续遵守这些协议。

156. 因此,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战略将首先意味着《联合国宪章》中所载集体安全体系的有效发挥作用。此外,这一战略还将包括下列方面:各种区域合作安排,旨在增进人们的信心,即和平将得到促进,侵略将受到反对;采取政治和军事措施,以期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这无论是在双边、多边、区域还是在全球国际关系方面都是如此;以及,最后一点是,谈判达成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其中包括充分和切实的核查措施,以便在新的安全安排中注入信心。

157. 实施这一战略的速度和规模将必然因区域而异,并将因双边关系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模式在被遵循之后能够确保“防御性安全”的发展,各种具体措施还将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益和充分的办法不是提供一个模式,而是提供一系列选择,从中各国可以选择他们视为最适合于他们本国具体情况的措施。

A. 与《联合国宪章》一致的集体
安全、区域性及其他合作安排

158. 集体安全、区域性及其他合作安排可提供能使各国感到安全的真实基础。如果各国可以依赖于全球性、区域性、或其他安排来保障其安全和利益,那么他们就可以采纳与“防御性安全”相兼容的军事结构和战略思想。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其条款得到有效实施,则可向各国保证:如果它们的安全与利益受威胁,国际社会将随时愿意援助它们。其他的集体安全安排--无论是双边的、区域性的、还是其他安排--在向其成员

提供保障方面有着类似的有利的效果。最后,旨在增进经济、政治及其他形式合作的各種区域合作安排也可以促进安全感和信心,这些又有助于其成员采取“防御性安全”政策。

159. 《联合国宪章》的有效实施--包括各国坚决承诺遵守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切实和一贯地实施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是促进“防御性安全”的一个中心要素。1990年至1991年期间波斯湾的经验在这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实施制裁、随后核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确保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为这场危机作出的各项决议、以及最终使用武力来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均表明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提供必要的途径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击败伊拉克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的有效实施均进一步表明,如果联合国采取原则立场,则侵略是不会带来好处的。结果,企图违反国际法的国家现在面临这样一种可能,即联合国方面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使任何侵略不仅不能成功,而且代价极其昂贵。

160. 尽管波斯湾的危机表明:为了实施国际法,使用武力也许是必要的,但这一经验也再次强调必须找到方式来防止求助于《联合国宪章》中的强制实施条款的必要性。联合国必须在《宪章》的框架和条款范围内更加建设性地参与防御性外交、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工作。正如本报告第二章所述,最近几年联合国已加强在这些及其他领域的努力,而这为联合国今后的建设性参与预示着良好的前景。这样,联合国就可以加强集体安全的各项原则,以致使所有国家确信,它们的安全将得到保障。在这一基础上,各国就可以取得必要的信心,以便开始采取旨在使其军事能力面向防御的措施。

161.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其于1992年1月31日举行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级会议上讨论了这些及其他问题。在那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就“如何在《宪章》的构架和条款的范围内,加强联合国从事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能力与效力,提出它的分析和建议”。³⁰ 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维持和平”(A/47/277-S/24111)的报告中对这一请求作出了反应。该研究报告建

议,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目标必须是:

(a) 努力尽可能在最早阶段查明可能产生冲突的形势,在暴力发生之前,设法运用外交消除危险的根源;

(b) 在发生冲突的地方,致力于建立和平,以期解决引起冲突的问题;

(c) 在停止战斗的地方,不论和平多么脆弱,通过维持和平来努力保持和平,并协助实施调停者达成的协议;

(d) 随时准备在不同的情况下协助缔造和平:重建遭受内战和冲突破坏的国家机构和基础设施;在原来交战的国家间建立和平互利关系;

(e) 最广义地说,解决冲突的最深远根源:经济的绝望、社会的不公和政治的压迫。

该研究报告就联合国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若干建议在专家小组看来与“防御性安全”特别有关,特别是那些涉及预防性外交的建议。

162. 集体安全、区域性及其他合作安排的有效性表明,集体安全体系有效地发挥作用能够导致令人满意的结果,包括各国愿意采取符合“防御性安全”概念的政策。例如,战后时期,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提供了一个集体安全的构架,在这一构架中,原来的敌对国--包括那些曾经打过若干场破坏性战争的各敌对国--都已经和好和相安无事。

163. 区域努力的有利效果还反映于东南亚、非洲和中美洲。因此,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立建立了一种区域性合作安排,它首先缓解并最终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冲突。³¹ 尽管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合作一般仅限于对付外来挑战,但合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因素。它促进共同观点和立场的发展,鼓励相互协商来实现共同目标,这两者都进而促使成员国有兴趣解决分歧和缓和冲突。结果,现在人们普遍预期: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将通过和平途径解决。正是这一期望有可能使东盟各国采取防御性安全政策。

164. 在非洲,分区域集团,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南部非洲发展

协调会议、以及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共同体),多年来在其成员国之间都建立了信任关系。于1976年成立的西非经共体是一个尤其适当的例子。1981年,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协调和一体化又得到一项新的关于相互援助的国防议定书的辅助。该议定书规定避免在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时使用军事力量,并保证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它的有益性显示于1990年,当时成员国的监测部队被派到利比里亚,以避免一场全面的政治崩溃。这次行动,即更加为人所知的西非经共体停火监测小组(停火监测组),对非统组织来说已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楷模。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在南部非洲地区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自从1979年成立以来,它在成员国之间促进各种合作性安排。由于在南非出现真正民主以及它最终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前景,这一分区域性合作集团很可能发挥更大的建立信任的作用,并协助消除南非与其邻国之间的相互猜疑。另一方面,中非共同体在联合国的协助下,通过建立一个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在研拟建立信任措施、该地区的裁军与发展问题方面也已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165. 同样,在中美洲,孔塔多拉国家的参与提供了必要的框架,从而促使参与该进程的中美洲五国之间的关系迈向了相互安全的道路。当中美洲国家间及它们国内出现争端时,邻国以公认的真正中立的态度参与努力,产生了令人放心的效应,这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和平地解决其争端。结果,尽管1989年6月的《孔塔多拉关于中美洲和平与合作的文件》所载明的关于中美洲各国军事力量水平和行为的各项条款在达成一项全面解决之前无法实施,但是现在这样一项全面解决已在实现当中,中美洲各国可以认真地考虑采取这些军事措施。其结果将是进一步强调每个国家军事能力的防御性质。

166. 这些例子表明,集体安全、区域性及其他合作安排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利于各国采取有助于促进“防御性安全”的措施。这些安排培育了有利于以谈判、调解及其他途径和平解决争端的气氛,从而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将会通过除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途径得到解决。一旦各国有了这种确信,它们就可能愿意

和能够减少军事力量在其相互关系中的作用,并采取更加防御性的军事结构。

167. 各国已普遍清楚地认识到有效的集体安全和合作性安排的好处。然而,人们对联合国以及各种区域及其他安排是否能够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发挥作用仍感到怀疑,这使得某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处于容易发生冲突地区的国家,谋求通过扩充军事力量来得到保障和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不断获取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可能会削弱一个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安全,因为这样会引起猜疑和使人感到有侵略企图。为了减少这种局面所带来的危险,可以采取旨在减少有关地区的紧张和威胁的政治努力,并着眼于解决冲突的根源。

B. 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

168. 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谋求调节各国的军事活动以便防止在国际冲突中使用武力,并为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利用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一方面为使用武力设置障碍,另一方面使各国能够表明其和平意图。

169. 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措施的重要性,1988年它一致通过了“关于适当类型的建立信任措施以及在全球或区域范围执行这些措施的指导方针”。³² 同一年,大会在其第43/78H号决议中核可了该指导方针,并建议“各国本着主动精神,并在有关区域内各国的同意下,执行上述指导方针,同时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的具体政治、军事和其他情况”。

170. 旨在阻止使用武力的建立信任 and 安全措施,即使在冲突的真正根源尚未消除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其目标只是要协助防止一场双方都不想发生的战争。在从和平到战争的广泛范围内,可以设计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来帮助实现下列目标:禁止使用武力来达到政治恐吓目的;方便危机控制;针对武装冲突的爆发建立缓冲;减少突然袭击的危险;创造有助于防御的条件;以及促进武装冲突的结束。³³

171. 除了阻止使用武力之外,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的目的还可以旨在使各国

能够表明其和平意图。³⁴ 这第二项目标可以通过减少笼罩着军事活动的秘密程度来实现。秘密色彩会促成捉摸不定和紧张加剧,从而因双方害怕突然袭击或错误地判断敌对国的意图而引发战争。在这方面,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的目标因而是要减少关于军事活动的秘密性。这样既可以减少捉摸不定,又可以提高可预见性,从而使别国相信任何军事活动都是例行的,实际上不具任何威胁性。这是为了使军事活动变得敞开透明,以便确定在和平时代对军事力量的“正常”使用。这样,任何军事活动或者将被视为正常活动,或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以及早地预示情况不对。

172. 尽管许多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都是旨在实现上述目标,但是每一项措施都将属于下列五个类型之一:情报措施、通讯措施、获取情报措施、通知措施、以及限制措施。³⁵ 并非每一项措施都将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同的区域条件将要求拟定一整套多种多样的措施。本文件不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可能最适用于哪一种情况,而只是在下文中提供若干具体实例。虽然欧洲的经验为拟订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提供了丰富的实例,但在其他区域条件下,也存在着大量经验,其中显著地包括中东及中美洲的经验。

1. 情报措施

173. 情报措施包括交换军事力量和活动的资料,其主要目标是增加透明度,并因而减少对别国军事力量和布置的不明。当然,这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提供错误的情报可能造成可预见性的假象。在这方面,交换资料不会提高透明度,反而会起到欺骗的作用。因此,具有检查这些资料的能力非常重要,所以通常在采取情报措施的同时,还应当采取获取情报的措施。但是,即使没有合作性的核查措施--如相互观察和(或)视察的权利,各国仍然可以象在没有交换情报的情况下同样利用国家技术手段检查情报的真实性。

174. 1992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认识到情报措施的重要性,通过了“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指导方针和建议”。³⁶ 该指导方针订立了在军事事项方面的

情报措施的原则和目标,除其他事项外,规定“各国均有提供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的责任和取用这种资料的权利”。

175. 交换情报的原则目前在欧洲已得到良好的发挥。甚至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部分要求之一,就是欧安会的35个国家必须提前21天通知其军事演习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关于计划中的军事活动的情报。但是,提供关于军事力量的资料还是更为最近的事。直到1987年的《中导条约》之后,美国和苏联才必须就其实际军事力量交换资料。在此之前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并没有对交换资料作出规定,而条约遵守情况只能根据通过国家技术手段所获得的资料来加以评价。

176. 自从《中导条约》签署以来,关于欧洲国家之间交换军事情报的条款规定已大幅度增加。例如,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1992年维也纳文件的缔约国每年必须交换下述情报:

(a) 地面部队和空军的指挥机构(包括防空航空兵和常驻地面的海军航空兵),下至旅/团和联队/空军团和同级单位;

(b) 每一编队或单位的番号和所属部队、无论是现役或非现役,其正常平时所在地,以及平时的核定兵力;

(c) 主要建制武器和装备系统,说明每一类型的数目:作战坦克、直升飞机、装甲战斗车、装在装甲车上的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火炮、迫击炮、多管火箭筒、装甲车辆架设的桥梁、战斗机、以及关于所有主要武器和装备系统的全面的技术资料;

(d) 主要武器和装备系统的布署计划以及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
欧洲常规部队条约中关于提供装备方面情报的规定也十分广泛。

177. 情报措施的重要性还反映于最近各项区域军备控制提议对这些措施的重视。例如,根据1991年7月由洪都拉斯提出的中美洲安全条约草案,中美洲五国必须每年交换关于其武装部队组成的资料,包括这些部队的机构、所在地、武器、物资

和装备(A/45/1038-S/22822)。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法国政府于1991年6月3日宣布其“管制军备和裁军计划”,其中强调,着重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区域性安全倡议十分重要。根据这一计划,“信任的首要前提是互通情报……即,就武装部队的实力和状况以及军队的调动情况互通情报”。³⁷

178. 在国际武器转让方面也已提出了各种情报措施。1991年7月,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举行会议,表示他们“支持联合国继续努力,以期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设立一个武器转让登记册”。³⁸ 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如何促进国际常规武器转让的透明度的研究报告(A/46/301),其中要求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设立一个普遍和一视同仁的武器转让登记册。根据该研究报告,这一登记册应当以下列一般特点为依据:

- (a) 登记册应该设计得可以迅速执行;
- (b) 应该普遍地参与登记册,包括武器供应国和接受国在内;
- (c) 登记册的基本要素应该是能够从所有国家得到标准化的、可以比较的情报;
- (d) 登记册的设计和维持应该能够提供旨在建立信任,在单边、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促进武器转让的节制,在较低军备水平上提高安全,并允许及时的识别武器转让趋势的有意义的情报;
- (e) 设立的登记册应该有可能根据需要扩大包容得更加全面。(见A/46/301,附件,第161段)。

179. 根据这一研究报告以及在联合国以外提出的各种建议,大会1991年第四十六届会议讨论了国际常规武器的转让的透明度问题。经过深入的讨论,大会作出了一项决定,它实际上综合了在讨论过程中人们提出的各种看法。实质上,该决定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讨论这一整个问题,因为它不仅讨论到武器转让,也讨论到武器生产的问题。因此,大会在其第46/36 L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其中载列有关如何通过进一步增加申报设备的类型并包括关于军事财产和通过国内生产进行采购的

数据,以期及早扩大登记册范围的方法。而且,秘书长将于1994年编写一份关于登记册持续操作的情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与此同时,秘书长将除其他外,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结果。该决议还请裁军谈判会议处理“同武器过多的和助长不稳定的积累的问题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包括军事财产和通过国内生产进行的采购,并拟订增加这个领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具有普遍性和不存差别待遇的实际办法”。此外,决议还请裁军谈判会议“根据现有法律文书处理增加有关具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的转让和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问题并拟订其切实实施手段”。因此,1992年5月,裁军谈判会议决定在其1992年的议程中列入一项关于军备的透明度的新项目。

180. 情报措施还可包括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资料。例如,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已经同意在自愿基础上交换关于生物活动的情报,包括关于过去的研究和发展方案、以及关于疫苗生产设备的情报。印度和巴基斯坦根据其关于互不袭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于1992年1月1日交换了关于这些设施的地点的情报。此外,秘书长在其关于建立中东地区无核区问题的报告中除其他外提议,中东各国单方面申报他们各自在核领域里所进行的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管制之下的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铀的采矿或加工、重水或氘的生产或储存、以及任何能够处理那怕是很少量的、不受标准保障协议所管制的可裂变物质的研究设施。而且,已有大量国家宣布它们决心在化学武器公约完成的时候,成为该公约的创始签署国。美国和苏联于1989年9月签署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谅解备忘录是另一项重要的情报措施。它规定,除其他外,就两国各自的化学武库的地点、组成和数量交换资料。

2. 通讯措施

181. 通讯措施是建立信任的和安全的正式措施的最早形式之一,至少可以回溯到1963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签订的“热线”协定。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就歧见进行讨论和对彼此的意图达到更深了解的场地。进行对话可以消除各国之间的歧

见,避免误会并增加透明度。因此国家间谈判的实际进程是一种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手段,不论这些谈判是为了解决冲突或制订武器管制措施。这些进程包括国家间的对话,通过对话而改变对对方的意图的认识,重新界定各自的利益,以及对彼此关心的问题有更好的了解。因此愿意参与谈判进程是在建立相互信任的道路上采取的第一个有益步骤。

182. 除了谈判程序之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成功的事例。这此事例包括:以色列-埃及关于西奈半岛的协定将联络工作列入观察和检查的规定内;欧安会成立防止冲突中心;以及在欧安会主持下举办军事学说讨论会。

183. 通讯措施(与其他措施相配合时)的一个最突出的成功例子或许就是1974年1月《以色列-埃及脱离接触协定》规定让以色列和埃及联络官员参与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的各项核查活动,成立该紧急部队的目的在于监督该协定的执行工作。³⁹ 这项规定有助于在当时仍然处于正式战争状态的两国间建立信任。根据1975年的《临时协议》,合作的规模后又扩大,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以色列-埃及联席委员会,其任务是监测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现场解决有关的问题和误会,并作为两国与紧急部队和美国西奈支助代表团之间的联络机构。

184. 这项经验被作为1979年《和平协定》中更加广泛的联合核查条款的基础。根据这项协定,将《临时协定》所规定的联络制度予以扩大,不仅包括多国部队和观察员合作监测《协定》的执行情况,并且还包括直接负责解决有关问题,以及防止因错误或误解而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在阿里什和贝尔谢巴设有联络办事处,均由资深军事官员担任领导。在这个级别无法加以解决的困难则交由联席委员会解决,这个委员会由将军担任领导,每两年或应所涉各方的一方提出要求时举行会议。这些努力取得成功的证据是,没有出现重大的不遵守协定的纠纷,各方均能按照协定的条件遵守一般性的协议。总的效果是,这种通讯措施有助于在四分之一世纪内打了四次主要战争的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信任。

185. 1990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期间也商定了两项通讯措施。一

项通讯措施是在参与国的首都之间建立直接通讯,传递与《维也纳文件》所载的获得协议的措施有关的信息,此外还按照1991年6月所作的决定,传递与紧急情况有关的信息。另一项措施包括设立防止冲突中心。这个中心的职务之一是解决参与国对“不寻常的和未列入时间表的军事活动”而提出的安全问题。如果开展了这类活动,而开展活动的国家未能满意地解答另一国所关心的问题,则后者可以要求该中心协商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因此防止冲突中心可以作为一个进行磋商的场合,并以相互都能满意的方式就解决争论中的问题进行可能的合作。

186. 关于通讯措施的一个重要的当代案例是在欧安会主持下举行的军事学说讨论会。第一次这类讨论会于1990年1月举行了三个星期,第二次则在1991年10月举行。两次讨论会的形式包括对各参与国的军事学说进行一次介绍性解释,并就军事部署、培训和演习以及预算进行讨论。后三项主题使与会者有机会说明他们的军事学说如何反映在他们军队的结构、培训和支出上。

187. 在1989年的革命事件发生以后不久,出席第一次军事学说讨论会的国家有来自欧洲和北美洲的最高级别的参与者。该次讨论会不但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使参与者相会,进行个人接触,还使参与者有机会询问东欧国家宣布的军事学说的性质及其改革的内容。同样的,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利用机会询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关于他们的前瞻性防卫学说和他们的后续武力攻击概念,许多国家曾认为这种概念具有攻击性质。会议的结果是,许多北大西洋公约国家对于当时在东欧进行的军事改革有了一种清楚的了解和信任。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对于何以后续兵力攻击概念会使东欧担心的问题有了更好的了解。

188. 1991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军事学说讨论会使用的形式与第一次讨论相同。该次讨论会正好在罗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之前举行,并且当时苏联的形势非常动荡不安,因此讨论会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但是,没有争论就是一个好的迹象,它进一步证明新的合作精神正取代过去的对抗习惯。讨论会鉴定了一些可以在较短但较经常性的讨论会上联合探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建立稳定的常

规兵力的条件;防卫性和攻击性武装兵力的性质;一方让另一方处理危机的军事活动可有多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以及反攻的能力而不至在战略上感受威胁;为保持相互信任所必须具有的限制条件;军事演习的形式;透明度的规定以及军事动员等。这种办法可以避免陷入讨论战略概念的攻击或防御性质的缺点,因为承诺不侵略或保持合理的充分军力对于安全和稳定无法提供足够的保证。因此这里的假设是,安全概念的防卫性质和相应的政策必须在其军事战略部署的防卫性安排中得到强调,因为这种安排会影响到武装部队的军事活动、战略和战术的级别。

189. 简言之,不同国家的军事官员之间就战略概念进行讨论可以在国家之间发挥有益的建立信任作用。愿意提供有关资料,就军事问题展开影响深远的讨论,以及对军事部署、装备水平和培训能力进行解释是降低机密性,不确定性和错误的最直接途径。当然,欧洲经验表明,政治关系必须改善到某个程度才能够进行有益的军事对话。如果会议的气氛充满怀疑和恐惧,则对话可能就成为一场相互宣传甚至歪曲宣传的活动。但是,一旦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则广泛的军事对话比任何其他措施更有利于加强彼此的信任。

3. 资料检索措施

190. 资料检索措施是核查根据各种资讯措施交换的数据资料的精确性以及作为通讯措施的一部分而提出的说明的可靠性的一种手段。如上文所指出的,欺骗性的资讯和说明会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资料检索是核查这些资讯的精确性的一种手段。此外,资料检索还有助于实现所有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目标:打破包围军事活动的机密壁垒,提高军事活动和军事能力的透明度。资料检索措施的例子包括观察军事演习、现场检查军事活动和对军力设限的情况,以及开放天空的机制。

191. 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包括早期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提出的观察规定,根据这项规定,当时各方仍然在纯粹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邀请它方观察可发出通知的军事活动。但是这种资料检索措施具有的自行裁决性质降低了它作为创立开放的

一种手段的价值,虽然这项措施的确使一些国家得以通过发出邀请而使其邻国感到安心。这项规定在1986年的《斯德哥尔摩文件》中得到加强,该文件是作为欧安会进程的一部分由谈判取得的结果,在1992年的《维也纳文件》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后一项文件的条款,强制规定凡是有13 000或更多部队参与的演习(如果涉及两栖登陆或空降部队跳伞进攻的演习则为3 500),则必须向其他参与国家发出邀请书。在《中美洲安全问题洪都拉斯条约草案》中也载有类似的规定,对于每一次可发出通知的军事活动都必须发出观察邀请书。

192. 一种更加深入的资料索取措施是进行现场和空中检查。在欧洲,直到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题斯德哥尔摩会议结束时才就仓促通知下对可发出通知的军事活动进行检查的权利首次达成协议。1992年《维也纳文件》规定,各参与国必须每年至多接受对于正要举行或怀疑可能举行的可发出通知的特定领域的军事活动进行三次检查。这些检查工作可以在陆地或空中进行。在中导条约、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和裁武会谈条约这类主要军备限制协定中还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检查形式。

193. 现场检查权不是欧洲协定所独有。在中东,检查规定是以色列一方以及埃及和叙利亚一方之间达成的各种协定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按照《1974年以色列-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负责进行日常的和突击性的现场检查工作,并负责对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一般监测。每15天进行一次以上的日常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在各方的脱离接触限制区内核查有关军队、军备和武器系统的限制情况。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可以在任何一方提出请求时执行突击检查。在所有情况下均需将检查结果通告双方。虽然不许所涉各方实际进入检查地区,但是联合国部队执行的检查任务有助于建立信任,从而使双方能够遵守已生效18年以上的协定。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联络制度,以及联合国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任务期限每6个月须延长一次的规定,因此与以色列-埃及协定相比较,它建立信任的基础要弱得多。

194. 如上所述,以色列和埃及的联络官参与了由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根据以色列-埃及部队脱离接触协定》而开展的各项检查活动。《临时协定》扩大了这种参与机会,允许双方进行空中观察,但不得超过缓冲区。此外,它们可以使用空中侦察飞机,但不得超过缓冲区的中线,每周可以利用两架飞机飞行7次,飞行高度不得低于4 750米。最后,双方各在吉迪山口的一方建立一个使用视觉和电子监听系统的预警站,工作人员至多不超过250人。根据该项协定,禁止在预警站布置攻击性武器。正如所指出的,《和平协定》提出的检查规定甚至更为严格。

195. 最后一个例子是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7月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首次提议的资料核查措施。这是一种美国-苏联“开放天空”作法的构想,根据这种构想,各方均可在另一方领土的上空开展空中照相任务。1989年5月乔治·布什总统重新提出这个构想,24个欧安会成员国在1992年3月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该条约开放给欧安会所有其他参与国签字。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此之前已签订了一项允许相互在另一方领土上空飞行的协定。

196. 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空飞行的协定提供了很大的核查机会,可用来确定是否有造成威胁的军事活动,是否遵守协议的各项措施和军备限制以及是否更加愿意开放社会让外界进行检查,以证明其和平意愿和善意。开放天空的作法提高了透明度,是一项在国家间关系中加强信任所依赖的在保证安全和可预测性的额外措施。

4. 通知措施

197. 通知措施要求各国相互通报本国即将进行的军事活动,目的是提高可预见性。所以这些措施允许进行此类活动,但是保证进行此类活动不会使任何国家感到突然。此外,事先通知这项要求也间接劝阻各国不要在未发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某些军事活动。目前实行通知措施的例子包括发射弹道导弹、举行军事演习及调动部队和装备。每项措施均试图以通知他国将要发生的行动的方式消除进行具体军事活动的突然性。其结果是提高了可预见性。

198. 按照1971年《关于减少苏联和美国之间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定》，如果导弹发射超越本国领土并朝着另一国，则两国均须将计划中的导弹发射事先通知对方。因此这种通知消除了两国的担心，即朝着本国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会是攻击的开始。1988年，美国和苏联扩展了1971年的协定。两国商定至少提前24小时将计划中的战略弹道导弹的发射日期、发射地区和着陆地区通知对方，而不论导弹飞行方向和着陆地区如何。该协定再次有助于使双方确信，一次导弹发射并不意味着攻击迫在眉睫。

199. 在常规部队领域，事先通知军事活动一般涉及军事演习及部队或装备的调动。例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协定均列有关于事先通知的广泛规定。按照《赫尔辛基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的最后文件》，各国必须提前21天相互通知动用25 000名或以上部队人员的重大军事演习。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文件消除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一些语言上含糊不清之处和某些措施的自主斟酌性质。按照这些协定，以下军事活动需事先通知(括号中为各类通知所需提前的时间)：

(a) 涉及至少9 000名部队人员或250辆坦克的重大军事活动、“集结”或调动(42天)；

(b) 涉及至少3 000名部队人员的两栖登陆或空降(42天)；

(c) 涉及40 000名以上部队人员的大规模活动(2年)。

200. 洪都拉斯提出的《中美洲安全条约》草案(A/45/1038-S/22822,附件)也载有与可通知军事活动有关的广泛规定。条约草案明确要求缔约国在以下情况提前30天通知军事活动：军事活动距另一缔约国边界不到30公里；有外国部队参加；有1 000名以上兵员或100名以上海军兵员参加；300名以上伞兵空投；涉及的飞机或直升飞机在20架次以上。

5. 限制措施

201. 和前四类措施不同，最后一类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措施实际上禁止具体

的军事活动。因为限制措施要求提供更多的情报并实际上限制军事行动,而不是仅仅要求就军事行动事先提出通知或进行观察,所以从本质上说这类措施比其他措施更难谈判。因此,除一类具体的限制措施外,迄今谈判的限制措施寥寥无几就并不奇怪。这项例外是关于脱离接触区,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中东一直存在这种脱离接触区。其他限制措施则是对军事演习的规模、频度和(或)持续时间施加限制。

202. 作为解决阿以冲突构架的一部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提示在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建立脱离接触区。又经过1973年的一场战争,这些建议才有了结果。作为《以色列--叙利亚部队分离协定》的一部分,在戈兰高地分离线两侧设立了脱离接触区域,具体规定是在分离线以东和以西20公里的这两个区域内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人数不得超过具体的上限。虽然细节仍属机密,这些区域内的限制既适用于兵力,也适用于可用于进攻目的的某些类型的武器(包括坦克、大炮和地对空导弹)。

203. 关于1974和1975年的西奈协定规定设立的脱离接触区,可获得较详细的资料。按照《以色列--埃及部队分离协定》在各自的军备和部队限制区,每一方的军力限制在30辆坦克和7 000名部队人员以内。此外,属禁止之列的还有:射程超过12公里的大炮;可干涉对方在自己部队上空飞行的武器;导弹发射地的固定装置;地对空导弹;射程可达对方分离线的武器。在《临时协定》中,这些限制有所放宽,这就是在各自的部队限制区,允许双方部署不超过8 000名部队人员、75辆坦克和72座射程小于12公里的大炮。⁴⁰

204. 各项阿拉伯--以色列脱离接触协议首次对在具体区域部署被认为具有进攻性的武器施加限制。如果和第三方主持的广泛的核查措施相结合,成功地执行这些脱离接触规定的结果是,万一即将发动进攻,双方均得到较多的预警时间。此外,由于建立了双方之间的缓冲区,从而减少了错误估计和偶发战争的风险。这样就提高了可预见性,为在敌对双方之间建议信任奠定了基础。

205. 不过,不应高估脱离接触区的实际军事作用。因为脱离接触区范围有限,如

果发生危机,双方可在数小时内重新引入进攻能力。因此,在冷战高峰时期提出的关于在欧洲建立这类脱离接触区的建议(如葛罗米柯计划、拉帕茨基计划和凯南计划)均未被接受。不过近来,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建立脱离接触区的构想在欧洲获得越来越多的注意。这些建议中的构想与其说是分隔敌对双方(如中东的情况),不如说是加强和显示和平意向。1989年11月,匈牙利提出了在阿尔卑斯--亚得里亚区域建立一个“信任区”,禁止在距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共同边界50公里的区域内部署进攻性部队,其理由即为脱离接触区具有建立信任的作用。1991年7月希腊提出建议,限制在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边界交错地区部署坦克、装甲车、大炮、战斗机和攻击直升飞机这类武器,其理由和匈牙利提出的类似。1991年12月,保加利亚和希腊签署了此类内容的一项协议。

206. 第二种限制措施涉及限制诸如部队演习和调动这类军事活动的规模、频度和(或)持续时间。迄今,在欧洲现有的此种限制涉及以下种类的军事活动:

(a) 每两年不得举行一次以上动用多于40 000名部队人员或900辆坦克的军事活动;

(b) 每年不得举行六次以上动用多于13 000名部队人员或300辆坦克的军事活动;

(c) 在后一种情况下,每年不得举行三次以上动用多于25 000名部队人员或400辆坦克的军事活动。

6. 从近期经验得到的教训

207. 虽然欧洲、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建立信任制度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这些经验为尚未开始就建立信任作出努力的区域提供了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并非提出各国或许愿意谈判的具体措施,而是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建立信任制度提供有益的指导。

208. 教训一。虽然可以设想一系列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措施,谈判关于具体

措施的协议需要时间。在国家间消除冲突和建立信任(更不用说建立安全)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公平处理各种问题,并且需要时间才能实现预想的效果。在国家间的关系上,克服历史上的敌意,将利益冲突降低到比较易于处理的水平,纠正笼罩决策过程的错误观念,减少怀疑,这些都需要时间。35个欧安会国家费时11年,才从基本上是关于斟酌采取措施的协议过渡到一个更加具有活力的建立信任制度。主要对手之间就实际削减部队达成协议又花了四年时间。在中东,以色列和埃及证明能够在五年时间里建立一种广泛的制度,但是以色列和叙利亚尚未超越1974年做出的初步努力。在中美洲,现在刚开始为类似1986年的《孔塔多拉文件》或较近期的《洪都拉斯条约草案》中所载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奠定基础。总之,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信任;这必然是一个逐步的并且是艰辛的努力过程。

209. 教训二。减少军事活动的秘密性可改善国家间建立信任的努力。过度保密造成国家间关系中的怀疑、误会和误解,促使各国根据最坏的假设制订计划。因此,透明化是建立信任的必要基本条件。而透明化的关键是交换资料和核实资料准确程度的手段。因此,建立信任始于资料和沟通措施,同时还要有渠道措施。

210. 就计划中的军事活动提出通知给和平时期的军队行动带来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首先在政治级别并随后在军事级别进行的密集对话为各国提供了解释意向的机会并迫使它们以令人安心的方式说明其军事活动的理由。关于军事问题的深刻而透彻的对话还迫使各国设身处地观察他国如何看待本国的行动。随着相互理解的增长并且防御意图变得更加显然,各国可以进而谈判将在实际上限制或禁止某些军事活动的措施,它们会认为这类活动对达成正当的防御目标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威胁性。

211. 教训三。专门涉及冲突频仍的高度紧张区域。在这些区域,第三方的参与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益于有效的建立信任过程。冲突各方均认为是中立的第三方的参与常常是谈判开始的必要条件。第三方可以是一个国家、国家集团、区域组织或联合国。

212. 从近期经验可得到的最后一项教训是,各国首先必须相信部队态势的防御性质,然后才会愿意实际削减构成这种态势的军事能力。一旦部队态势透明化并且各国能够充分相信从整体说部队是为防御目的部署的,各国就会愿意参加将导致实际削减军事装备的过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实际执行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措施之前,不可能就削减部队达成协议。一旦更大的透明度降低了保密度,和平时期军队活动的可预见性提高了并且国家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互信,这时各国可能愿意开始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困难进程。

C. 武器限制与裁军

213. 与建立信任和建立安全的措施不同,武器限制与裁军的协议旨在通过限制和(或)减少实际的军事能力来影响对峙的军事力量的结构。一旦建立了足够程度的相互信任或认识到了少量的共同利益,各国可能会决定其安全获得保证的最佳方式在于互相限制各自的军力。这样,传统上军备控制的目的(即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战争中的损失以及维持军力的费用),就可以实现。

214. 此外,武器限制与裁军协议能够直接地有助于“防卫性安全”。以其细节而定,军事力量的防御倾向可以通过限制、平衡或削减其军事力量中某些“进攻性”方面的协议而得到增进。至于最终应当被消除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任何削减这些武器的协约原则上都应当会增进“防卫性安全”。常规武器限制与裁军协议也可以促进“防卫性安全”,其前提是要特别注意协约所影响到的武器及武器系统,以及限制或削减这些武器采取什么方式。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不同,某些常规武器的限制与削减可能会减少而不是增进有关军事力量的防御倾向。因此,为了促进“防卫性安全”,就应当考虑常规性武器限制和裁军协议的具体内容。此外,正因为此,影响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常规武器的协议两者之间必须作明确的区别。

1.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215. 在一个已经全面实现“防卫性安全”的世界里必须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的确应当是所有国家的目标。但是,从现状转向这样的世界可能需要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至少一些国家将会继续拥有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器限制和裁军是进一步削减并最后消除这些武器的过程的一个部分。这对一些种类的武器可能会容易些(例如生物武器已经被禁止了),而对另一些种类的武器(核武器)不就那么容易,同时,在一些地区会比另一些地区容易一些。

216. 根据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公约签署国同意不研制、生产、储存或取得“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剂,或任何来源或任何方法生产的毒素只要种类和数量不是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应当有的”及“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类生物剂或毒素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第2826(XXVI)号决议,附件,第一条)。至今,已有120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

217. 《生物武器公约》是有史以来所缔结的第一项全球性裁军协议,它是走向废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目标的极为重要的一步。由于在生物技术方面的革命,由于一些缔约国对遵守公约的关注,以及由于据报道一些非签署国对生物武器的兴趣,近年来已作出努力要加强该《公约》。例如,在1986年《公约》缔约国的第二次审查会议上,各方同意应当及时召开审查有关遵守情况的关注的协商会议,以审议各项问题,建议澄清措词含糊内容的方法,或在联合国范围内并根据《宪章》开展各项程序。最后,为了建立对《公约》的信心,参加会议的缔约国同意交换有关直接联系到《公约》的生物学活动的情报。⁴¹

218. 五年之后,在1991年9月的第三次审查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缔约国还同意不仅加强现有的措施,而且还要增加三项新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关宣布过去在进攻性和(或)防卫性的生物研究发展方案的活动,及宣布生产疫苗的设施。会议还决定建立一个特设政府专家小组,以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根据缔约国在

审查会议上同意的一些标准去辨明并研讨可能的核查措施。⁴²

219. 目前只有一项多边协议指导有关化学武器的事项。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气体,以及细菌战,自1980年以来,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一直在就制定一项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进行谈判。1989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会议上,有149个国家强调指出了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重要性,并促请所有国家在该公约缔结后立即成为其创始缔约国。

220. 在日内瓦的谈判现在已进入最后阶段。1992年,裁军谈判会议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旨在于1992年就化学武器公约取得最后的协议。根据该公约,缔约国将同意全面和有效地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该公约还将包括有关下列各方面的条款:有关取缔化学武器的援助和保护;经济和技术发展;补救某种情况以便保证遵守协议行为的各项措施,包括制裁在内。

221. 为了迎接并补充日内瓦关于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圆满结束,一些国家提议了对化学(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事双边和区域的限制。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美国和苏联(此后已得到俄罗斯的重申)同意销毁多数其大规模的化学武器储存,并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这项于1990年6月签署的协议,尽管目前还没有生效,但是,据此双方都承诺到2002年将其库存武器减少到5000吨,这是对这两个国家库存武器削减达80-90%。

222. 近年来,在同样的精神下已提出了一些禁止化学武器的区域协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中东。例如,1991年9月,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然后又加乌拉圭、接着是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拉圭签署了《关于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联合声明》(门多萨协议),其中宣布“各国充分承诺不研制、生产、以任何方式取得、储存或保存,直接或间接地转让或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A/46/463,附件,第1段)。同年稍后,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签署了关

于废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卡塔赫那宣言,其中宣布各国承诺“放弃拥有、生产、研制、使用、试验和转让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管其属于核子、细菌(生物)、毒素或化学武器,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储存、取得或保存这类武器”(A/46/760,附件,第2段)。最后,洪都拉斯于1991年7月提出的《中美洲安全条约草案》规定,五个中美洲国家应当同意不取得、维持或在其领土上部署化学、辐射和生物性武器。

223. 在中东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构想至少可追溯到1974年,当时伊朗,后来又加上埃及首次提议在该区域内建立无核武器区。自那时以来,联合国大会就始终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中促请采取“必要的切实和紧迫的步骤,以执行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⁴³ 自1980年以来,这些决议一直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224. 近年来由于据报道该区域内有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扩散,以提出提议要在中东消除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例如,1989年1月,以色列提议在中东建立无化学武器区。⁴⁴ 1990年4月埃及提议在中东建立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⁴⁵ 这项提议得到广泛的国家、区域和其他组织的赞同,并得到安全理事会在第687(1991)中所表示赞同。该决议强调指出,针对伊拉克的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及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而对该国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应当被看作是“实现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这种武器的导弹的地区这一目标以及实现全球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目的的步骤”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在美国总统布什1991年5月关于中东武器管制建议以及法国1991年“武器管制和裁军计划”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而法国的计划还强调区域性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也应当在世界其他地区推行。

225. 如果细菌性(生物)及毒性武器公约得到加强,而且化学武器公约得到迅速缔结(这两个事项现在看来都能很快实现),那么这将是朝向促进“防御性安全”的关键步骤。这些公约将重申一项首先于1925年列入《日内瓦公约》中的国际准则,即使用(现在还加上拥有)化学与生物武器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

226. 关于核武器,近年来已有了重要的发展。在核裁军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削减核武库的政策也得到积极的推行。从禁止美国和苏联的中、短程核导

弹的1987年《中导条约》以来,核大国已着手齐心协力限制并减少各自的储存。1990年6月,美国和苏联同意对《级限禁试条约》及《和平核爆炸条约》的一项核查议定书,从而使这两项条约于同年稍后一些时间得到批准和生效。在1991年7月的莫斯科首脑会议上,美国和苏联签署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其战略性进攻力量裁减了30%。1991年9月和10月,美国和苏联分别宣布全面性单方面地削减部署在地面与海上的战术性核武器,并对战略核力量作了如以上第二章所叙述的变动。另外于1991年10月,北约赞同对其次级战略性核武器削减80%。最后,1992年6月,乔治·布什总统和鲍里斯·叶利钦总统同意将美国和俄国的战略核弹头从目前水平削减70%。

227. 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在制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国家继续存有着大量的核武器,一些国家还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及涉及这些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问题。因此,应当以越来越坚定的决心继续推进核裁军。在全面彻底裁军这一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过渡时期的目标构架内,核武器国家都应当对其核武器的储存坦允作进一步大幅度削减,作为走上其彻底销毁道路的一步。

228. 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情况对于实现一个基于“防御性安全”概念的国际关系制度造成了具体的问题。但是,近年来,通过各项协议并通过有效国际管制来限制并最终消除这些武器的前景已经有了很大好转。这一趋势是今后若干年促进“防御性安全”的一个很好的预兆。

2. 常规武器

229. 常规武器系统是维护《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个人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的正当手段。因此,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不损害各国满足其正当防御需要的情况下限制这样的武力。

230. 目前还没有一个既可以保证足够的防御能力又完全消除进攻能力的普遍适

用的限制常规武器模式。为此,必须将限制常规武器作为促进“防御性安全”概念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为此目的,在限制常规武器的同时,还应采取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以及加强集体安全的安排。

231. 为加强面向防御的军事能力而实行的常规武器限制应该至少具备三个要素。首先,应该平衡地削减因机动性大和火力集中而产生的战略攻击能力。第二,应该充分限制能够深入敌方领土摧毁其目标的武力。最后,应限制常规军事编制的备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使其符合防御需求。在其中的每个情况下,都必须确保在一个区域或次区域内相互、公平和平衡地削减这些能力。

232. 限制常规武器的重点应是削减使军事力量能够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行动和突然袭击的能力。这些能力由高度机动性和集中火力能力组成的武器系统。在海军方面,它们包括远程海军大炮和导弹、舰载飞机和攻击性潜水艇。在陆军则包括坦克、装甲战车、大炮、(包括迫击炮和多管火箭炮)、战斗直升飞机和飞机。因此,1990年11月《欧洲常规部队条约》严格限制这五类地面作战武器中的任何一类也就毫不奇怪了。限制这些武器是因为坦克和装甲车是夺取和占领领土的核心力量;大炮提供直接火力援助;直升飞机和飞机则将火力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个单一的武器系统之内。

233. 《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将双方(由北约国家组成的16国集团和由前华沙条约国组成的13国集团)的这几类武器限制在同一水平。⁴⁶此外,《条约》有一项“充分的规则”,根据这项规则,任何国家所拥有的所有受条约限制的武器不得超过一定比例(大约33%)。这一规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武器方面享有绝对优势,但也考虑到有些国家大于另一些国家的事实。《欧洲常规部队条约》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它限制将这五类武器中的任何一类的保留部队部署在特定的区域。因此,《条约》的适用地区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山都分成其个同心园,每个同心园的武力限制在一定水平。还确定了如何在侧翼地区限制武力,以考虑到这些地区的地理特点,并避免将武力集中在这些地区。

234. 这些限制要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消除任何国家在大西洋至乌拉尔地区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这两个国家集团的武力上限相等,保证了在较低水平的武力平衡;充分规则使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国家联盟采取攻击性行动;区域性的武力限制减少了在任何一个地点集结武力的可能性。《欧洲常规部队条约》以此方法有效地限制了采取大规模攻击性行动所需的充分的战略攻击能力。与此同时,《条约》允许各国保持有效防御所需的充分武力。

235. 以防御为重点的限制常规武器努力的第二个要素是酌情限制能够深入敌方领土攻击其目标的一系列武器系统。这里所指的主要武器系统是远程战斗机和舰载飞机,尤其是弹道导弹。如果一个国家部署了大批能够向远距离运送大量炸弹的轰炸机,它就有能力展开毁灭性的攻击性行动。如果它还同时拥有夺取和占领领土所需的大量装甲车队,尤其令人担忧。这就是为何应该就限制远程飞机达成协议,以便努力降低军队的进攻能力。

236. 这一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弹道导弹,尤其是远程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有效载重小,(至少与大型飞机相比),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深入敌方领土,因此它们尤其适合深入敌方领土攻击具有高价值的目标。即使命中率不高和只装有常规弹头,使用弹道导弹如果不能产生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话,也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影响,在两伊战争和最近海湾战争中的使用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弹道导弹具有双重能力,它们又是用来运载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最恰当武器,因此继续部署弹道导弹不符合“防御性安全”的条件。

237. 最近在军备限制特别是限制核武器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远程导弹产生的威胁。举例说,1987年的《中导条约》禁止美国和苏联部署射程500至5 000公里的陆基导弹和巡航导弹。根据1991年9月美国的倡议,美国和俄罗斯还要将短程核导弹和核武巡航导弹撤出前进地点和海军舰只。除了美国和苏联以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决定设法销毁伊拉克所有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

238. 这些例子表明,仍有可能达成协议,限制核领域以及常规领域的弹道导

弹。作为第一步,各国可着手就区域性限制弹道导弹进行谈判。举例说,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强调,应将禁止伊拉克使用弹道导弹看成是消除整个区域的弹道导弹的第一步。美国在1991年5月关于中东军备限制的倡议中也提议“冻结该区域各国拥有、生产和试验地对地导弹,以便最终从它们的武库中消除这些导弹”⁴⁷其他国家可能也愿意进行谈判,以便就禁止各自区域中的弹道导弹达成协议。

239. 常规武器限制协定的最后一个要素的目标是以防御为重点,限制平时和战时的军事编制的备战能力和持续性。和平时期的的高度备战能力和长时期在远距离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是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限制这些备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将有助于加强防御。

240. 可以限制和平时期军事编制中的人员数额来降低备战能力。这将需要按照协定各方可部署的军事装备水平来限制人员。还可从限制预备部队训练的次数和时间,以确保任何动员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降低部队备战能力的另一个方法是限制现役地面装备,把其余的装备储存起来。举例说,根据《欧洲常规部队条约》的规定,只能在现役部队中部署大约85%允许的地面装备,将其余的储存起来。如要取出任何储存的装备必须提前42天通知,而且必须在6星期之内送回储存地点。

241. 这些限制的实际效果是使现役部队更加依靠预备部队来取得战斗能力。鉴于预备部队不能马上变成作战部队,在接到通知后马上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也因此下降。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正在召集和训练预备部队,这就是一个警告,说明出了问题。在得到充分的警告之后,国家就可采取行动加强防务,并在外交前线解决可能的冲突。但是,应该记住上文第127段所提到的这些措施的例外情况。

242. 除了保持低水平的备战能力以外,限制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也可有助于表现防御性。这方面的关键因素将是相互削减部署在前沿阵地的后勤基地以及限制战斗支援行动的机动性。将燃料和弹药堆集场放在后方是表达防御意图的一个方法。如果将物品迅速送往前线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在远距离展开军事行动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因此,达成这方面的协定将会加强防御能力,并使防御能力超过进攻能力。

243. 涵盖这三个常规力量领域的武器限制协定可有助于使军事能力基本上更加面向防御。尽管协定本身并不能保证不再有能力展开进攻行动,但是它们可使这些行动更加困难,也较少成功的可能。其结果是,进攻性地使用武力的倾向将会减弱,对各自的基本防御意图的相互信任也会增强。当然,相互信任需要保证必须遵守谈判达成的协定。这就是为什么充分和有效地核查协定是促进“防御性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

3. 遵守情况的核查

244. 各国长期以来就认识到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效用取决于其是否包括充分有效的核查制度。只有协议各方确信对方将遵守协议条文时,协议才会产生预定效果。因此,遵守情况的核查是促进防御性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

245. 1988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商定了16项核查原则,用作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谈判中的准则。大会第43/81B号决议赞成这些原则,其内容如下:

- “(1) 充分有效的核查是一切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的必要内容。
- “(2) 核查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成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过程的必要内容。
- “(3) 核查应促进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的落实,在国家间建立信任,并保证各国遵守协议。
- “(4) 充分有效的核查需要使用诸如国家技术手段、国际技术手段和国际程序等种种不同的技术,其中包括现场视察在内。
- “(5) 军备限制和裁军进程中的核查将受益于较大程度的公开。
- “(6) 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应列有明文规定,各方在其中保证,只要协议的核查方法、程序和技术的进行方式符合协议中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不加干预。
- “(7) 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应列有明文规定,各方在其中保证不使用对是否遵守协议进行核查有所阻碍的隐蔽措施。

- “ (8) 为评价核查制度是否继续充分而有效,一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应规定审查和评价的程序和结构。在可能的情形下,为了帮助进行评价可为审查设一时限。
- “ (9) 在关于具体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的谈判开始和每一阶段都应处理核查安排问题。
- “ (10) 所有国家均有平等权利 参加对其为当事方的协议进行国际核查的过程。
- “ (11) 适当和有效的核查安排必须能够及时提供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遵守或不遵守情况。 关于遵守的不断确认是在缔约各方之间建立并保持信任的必要因素。
- “ (12) 仅应在一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范围内来决定旨在核查协定受到遵守的具体方法是否充分、有效和可以被接受。
- “ (13) 核查一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所规定义务的遵守情况是由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缔约方进行或由受到请求并经缔约方明示同意的一个组织进行的活动,并且它是参与此种安排的国家主权权利的表现。
- “ (14) 依照一项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的规定要求核查应被视为是核查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 这种要求应仅限于为确定遵守情况的目的而提出,要慎重行事以避免滥用。
- “ (15) 核查安排应无差别地执行,并且,在进行其目标时,避免不当地干涉到缔约国或他国的内政,或损害到它们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
- “ (16) 为充分和有效起见,一项协议的核查制度必须包括所有有关武器,设施,场地,装置与活动。”³²

246. 核查制度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的报告列举了五个具体的核查功能:评估执行情况、建立信任、处理不确定的情况、阻

止不遵守行为和及时警告(见A/45/372和Corr.1,第24-42段)。

247. 核查的主要功能是评估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各项条款的日常执行情况。各国必须有能力通过国家、区域、国际或合作手段评估所有缔约国执行协议条款的情况。协议的性质不同,具体的核查手段也不同。

248. 核查的另一功能是让各缔约国相信,协议的条款正在得到充分遵守。实现这一目标不应妨碍有关缔约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建立信任的两个因素是就协议所涉所有问题提供资料和各国是否有能力表明其资料完整无误。由于这两个原因,核查过程中的公开性十分必要,所以最近的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中才有条款禁止采取可妨碍核查的隐瞒措施,并允许通过国家和国际手段进行监测。其结果是使协议所涉的活动和事宜具有透明度,这有助于使人相信协议正在,而且将来也将继续得到遵守。

249. 同样重要的功能是设立程序处理与执行和遵守条约相关的不确定情况和虚假警报。这些程序很有必要,因为没有一项协议能充分预测到其所涉事项今后可能产生每一个问题。一个公开、合作的核查制度能防止这种不确定情况和虚假警报可能会来的不利影响。进行资料交流、增强核查措施和广泛的合作安排来扩大透明度、包括定期审查会议、协商程序和紧急会议等,都有助于处理潜在的不确定情况。

250. 各方商定的核查条款能阻止不遵守行为,从而在遵守方面建立信任。一个精心设计的核查制度将确保早期侦察并对不遵守行为提供明确证据。充分有效的核查规定会使不遵守行为付出更大的财政和政治代价,因此,有可能会阻止某一方作出此种行为。不过应强调,在阻止不遵守行为所需的措施和执行协议规定而又不过多造成虚假警报所需的措施之间,须取得平衡。

251. 这后一种功能密切关系到对可能发生的遵守问题提出及时的警报。出现这种情况时,其他缔约国可作磋商,向想进行被禁止的活动的缔约国表明立场,并说明继续遵守有关协议的益处。更多的深入监察就会能够更及时地进入最为关注的设

施和地区。计划适宜的突然视察在此尤有帮助。

252. 核查方法可分两种：国家技术手段与合作措施。国家技术手段是一国掌握的手段，可用来从远距离监测遵守协议的情况，其中包括观察卫星、机载系统如雷达和照相机、海基系统和陆基系统。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国家技术手段来核查遵守协议的情况，虽然各国的技术手段不尽相同。

253. 随着军备限制和裁军协议范围的扩大，合作措施愈发有用，其内容包括设计武器系统和布署方式时要使其易于核查，允许飞机观摩军事方面的设施和活动；在某些武器试验前发出通知以便使监测更为有效；进行联合核查试验以协助监测工作；安排外国代表观察或视察设施活动，并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和及时性，以及不干扰国家技术手段等。就协议所涉项目交流资料也是合作核查安排的重要部分。

254. 近些年缔造的协议中如果没有包括全部，也包括了大部分上述合作措施，例如《裁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载有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的设计应与不载有巡航导弹的机种设计不同，而且机动导弹要布署在指定地区。《欧洲常规部队条约》规定，某些直升飞机和飞机可重新分类，有些坦克和装甲战斗车辆可以改装，但这必须使其与被限制的系统有明显区别。《开放天空条约》规定有权飞越缔约国的领土。《维也纳文件》和西奈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也有飞越的规定。美国和苏联就战略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军备限制协议进行了联合核查试验。最后，现场视察近些年已成为军备限制和裁军的一个显著部分。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维也纳文件》、《中导条约》、《欧洲常规部队条约》和《裁减战略武器条约》均包括了一些例常和特别视察规定。最值得注意的现场视察制度是阿根廷与巴西的核协议，其中规定了一个负责和控制所有核设施和装置的共同制度。

255. 过去曾几度证明难以说服各国支持一个能有效完成这些功能的充分有效的核查制度。尤其是猜疑颇深的国家常认为能发挥其功能的核查制度所需要的深入和开放性质对其国家安全利益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各方共认为确实公允的第三方可起重要作用。例如，即便各国不信任其潜在对手的突发性视察，但也可

充分信任一个公允的第三方来做此工作。随着缔约各方之间信任的建立,核查便可由其自行进行。

256. 1970年代西奈协定的经验表明第三方进行核查十分有效。在所有这些协定中,联合国及美国的作用证明是促使埃及和以色列同意执行协定各项规定的重要一环。两国都认为联合国和美国相当公允,足以进行有效执行协定必不可缺的核查工作。随着双方间信任的建立,在核查商定的条款方面,联合国的作用,随后是美国的作用都减少了。最后,核查工作主要由埃及和以色列自行进行。

六、结论和建议

257. 本研究报告已经指出防御性安全概念及政策如何能作为实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的一项手段。报告的重点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采取切实措施,这些措施既符合又能执行《宪章》条款所说的防御及自制的重要构想。这些条款要求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要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并承认会员国具有进行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258. “防御性安全”的基础是认识到该构想的实现有赖于创造消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威胁所需的政治及军事条件。其目标是通过放弃政治及军事领域中看来具有威胁性、进攻性或挑衅性的措施,在各国之间建立协调的对话,加强集体安全及其他合作安排,采取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逐渐改变军事力量的态势以及减少军备等措施,促使人们认识到安全的不可分割性。这些步骤连同其他步骤可能有助于建立上文第12段所界定的“防御性安全”的条件。

259. 本研究报告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提倡全球性的“防御性安全”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现全球性的“防御性安全”需要分步骤进行,在各区域中均不相同,在每一双边关系中也不一样。最近,某些区域,国家间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因此,显然有可能在“防御性安全”原则基础上实现合作安全的制度。然而,在许多区域里,尽管正采取某些朝着“防御性安全”发展的初步步骤,根本性冲突仍然存在。

260. 尽管各国面临的安全状况各不同,但仍可采取某些步骤以实施“防御性安全”。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尊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集体安全的原则和规定。加强区域或非区域的合作安排也完全符合并能极大地促进推广“防御性安全”的战略。同样,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中旨在提高公开性及透明度的建立信任措施能减少保密程度和猜疑,并创造能使各国采取更具防御性军事态势所需的相互信任程度。限制某些军事活动,限制和减少某些具体的军事装备贮量以及有效和充分地核查裁减和最终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措施,也构成了一国军事力量改为防御态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261. 然而,在采取这些步骤时,各国应认识到,执行防御性战略概念及政策会面临若干问题。本研究表明,明确区分“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及武器系统具有内在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同军事队形一样,武器及武器系统既可用于“进攻”,也可用于“防御”。只有根据它们的使用状况才能明确加以区别。然而,使用状况本来就因具体情况而异。同样,人们也承认,集体防御的原则需要某些国家拥有可能超过防御其国家领土所需的军事能力。在这里,拥有和最终使用这种能力的唯一目的必须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进行集体自卫。

262. 专家小组认识到,由于各国在本区域所面临的具体安全状况很可能各不相同,因此,不存在普遍适用和现成的执行防御性安全概念的计划。所以,为确定在各自区域促进“防御性安全”的可能措施,应鼓励各国评估各自区域的安全状况,并确定执行防御性安全概念及政策的可能步骤和措施。在这些自愿评估的基础上,同一区域内的各国可开始进行对话,以便界定区域安全状况,确定促进防御性及自制的可能措施,以及为在今后执行“防御性安全”寻找基础。这项对话可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包括通过各种区域和分区域组织以及其他这类合作安排。

263. 联合国通过裁军事务厅可根据这些方针促进区域和分区域的对话,办法是召开各种专家会议、研讨会以及旨在一个非正式背景下讨论区域和分区域安全问题的会议。这类会议可参照裁军事务厅以往所组织的研讨会及会议的形式,尤其是在

大会所建立的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框架中进行。

A. 集体安全与合作安排

264. 近年来,加强区域和其他合作努力正积极发展。在各区域之中和各区域之间进行的政治及经济合作是建立各国相互信任的宝贵基础。加强各国关系之间的相互信任将能为今后执行“防御性安全”打下一个稳定的基础。

265.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区域一级防止冲突,控制危机和解决冲突。有关国家受到情况的最直接影响,因此,最能够评估在它们之间建立和平和加强安全所需采取的步骤。这些努力如果成功,可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相互信任。关于一般安全问题和特殊军事问题的区域对话极为重要,今后应鼓励各国进行这类区域对话。

266. 近年来,联合国地位的加强及其在解决世界各地若干冲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动态。然而,若要维持和扩大这种作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联合国对所有冲突局势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联合国建立和平作用的加强及其自198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维持和平行动表明,各国正致力于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同时,应及时提供联合国为应付这一迅速扩大的要求所需的财政、人力和技术资源,扩大联合国处理这些要求的能力。在这方面,专家小组认为,秘书长最近提出的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报告(A/47/277-S/24111)载有若干与“防御性安全”十分相关的建议,尤其是那些关于预防性外交的建议。

267. 如果能以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集体安全原则的方式集体采取军事行动,就能促使各国采取防御性军事态势,使它们不设法获得进攻性、威胁性和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能力。这样才能加强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从而有助于减少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268. 为确保集体军事行动所需的武力预测能力不被其他国家认为是具有威胁性

或挑衅性,专业化作用的构想值得进一步研究。

B. 公开性、透明度与建立信任

269. “防御性安全”概念的基础是各国认识到它们的共同安全是无法孤立开来的。这种认识可以通过政治和军事措施来促进。这两套措施的共同点是对政治与军事事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观念。过分的保密会制造不信任,从而造成一种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公开,很可能在各国之间的关系中建立起信任。

270. 本研究报告确定了一些可以在一段时间后促进公开性并建立信任的实际政治和军事步骤。在没有彼此采取同样措施的情况下,国家就没有什么促使其进一步公开的理由。因此,有关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的双边和区域谈判(其中包括情报、通讯、资料检索、通知和约束措施),是促进执行“防御性安全”的宝贵方式。同时,在有冲突的地区,采取增加公开性的步骤也许更要困难。

271. 最近从一些地区内这种谈判取得的经验对这一方面的今后努力具有实际的意义,其中包括:

(a) 尽管有大量的可想而知的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但是谈判关于具体措施的协议需要时间。防止国与国间的冲突并建立国与国间的信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对情况作公正的处理并需要时间来达到其所想望的效果;

(b) 各国间在军事方面建立信任需要公开性和透明度。尽管军事活动的有些方面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些机密的和保密的内容,应当严格地限制这种成分,以便消除导致不信任及最坏的设想的错觉与误解;

(c) 国家一旦对于敌对对面军事力量的防御性质有了信心,就更加愿意削减其自身的军事力量;

(d) 在某些情况下,有效地建立信心的过程可以从第三方的参加而受益。被冲突的所有各方都视为公平不偏的第三方的介入,常常是使谈判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第三方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些国家,一个区域组织,或者联合国。

C. 改革军事力量的结构

272. 一旦建立了足够程度的相互信任,或者确认了起码的共同利益,各国可能会决定其安全获得保证的最佳方式在于互相限制各自军力。这样,传统上军备控制的目的(即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减少战争中的损失以及减少维持军力的费用),就可以实现。此外,武器限制与裁军协议能够直接地有助于“防御性安全”。以其细节而定,限制或削减军事力量态势的某些方面的协议可以加强军事力量态势的防御性质。

273.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近年来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可以预计,继1972年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将会制订一个禁止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在核武器方面,东西方的军备竞赛已经停止,而且已经扭转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国家的武器库内继续存有大量的核武器,一些国家还在继续进行核武器试验,以及有关这些武器纵向与横向扩散的问题。因此,应当比以往更加坚决地推行核裁军。在完全彻底裁军这一需要很长的过渡阶段的目标的范围里,各核武器国家应当承诺进一步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器储存,作为走向完全消除核武器的一个步骤。

274. 旨在促进常规军事力量防御性质的武器限制和裁军协议应当集中在三个内容上。首先,应当以平衡的方式削减通过高度机动性及集中的火力相结合而产生战略性攻击力量的能力。第二,应当适当地削减能够破坏敌国领土腹地目标的军事力量。最后,常规军事编制的备战情况和持久力应当根据防御的要求有所限制。在作这种限制时,应消除展开大规模战略性进攻行动和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下,某一区域或分区域都必须保证在相互的、公平的和平衡的基础上削减其军事力量,至为重要。

275. 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军事限制协议将有助于加强军事力量的基本防御倾向。尽管各项协议本身并不保证没有发动进攻行动的能力,但是这些协议将使这些行动

既更加困难,也不太可能成功。因此,进攻性地使用军事武力的倾向将会削弱,相互对于彼此军事企图的基本防御性质将会增加信任。当然相互信任需要确保各项协约在缔结之后必被遵守。因此,对各项协议的适当和有效的核实在促进“防御性安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276. 正如本研究报告明确说明的那样,为使军事力量朝防御性方向实行根本改革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只有少数成功的例子。实现这种改革的模式非常复杂,谈判非常困难。各国为了在今后增加成功的机遇,可以开始就如何通过谈判实现军事力量走向防御倾向的改革的具体方式进行对话。联合国应当通过裁军事务厅以召开旨在更详尽地探讨这一问题的定期会议,讨论会和政府及非政府专家会议而对这一对话作出贡献。

D. 走向“防御性安全”

277. 对于世界安全状况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一些情况下“防御性安全”比较接近现实,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防御性安全”似乎很有希望,最后,更有一些情况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紧张与争执,风行的是仗恃军事力量的安全概念。尽管执行“防御性安全”的方式不同,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和尊重国际法却是必要的基础。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政治和军事事务上增进公开性和透明度也是必要的。本报告中还确定了其他一些措施与步骤。但是,最重要的是,各国应当承诺坚持展开区域和其他形式的对话以确定其可以单独地或集体地走向“防御性安全”的可能步骤。这样,所有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可以,尽管以不同的途径实现使“防御性安全”占上风的局面。

278. 大会在其第45/58 0号决议中请“会员国在双边一级,特别是在区域一级,适当时也在多边一级,发起或加强关于防御性安全概念和政策的对话。”为此,各会员国可以:

(a) 表明其对本研究报告中所确定的“防御性安全”的概念与目标所持的意

见;

(b) 审查其目前关于“防御性安全”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局面;

(c) 确定其国际关系、及对安全的承诺以及其区域局势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使它们考虑根据相互对等的方式采取措施,在双边、区域或多边的范围内实现“防御性安全”的局面。在区域或其他一级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各国可以考虑在它们自己中间进行协商;

(d) 单独或集体地考虑为按照《联合国宪章》履行集体安全的承诺所需要资源的有关问题;

(e) 随时让秘书长知道“防御性安全”方面的进展和倡议。

279. 据此,大会或愿使自己可以随时知道“防御性安全”的情况以及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注

¹ 例如,参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号》(A/46/1),第11至16页。

² 《和平与合作罗马宣言》(布鲁塞尔:北约新闻处,1991年11月8日),第2页。

³ 《在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及裁军问题会议文件》,斯德哥尔摩,1986年9月19日。

⁴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巴黎,1990年11月19日CD/1064。

⁵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华盛顿,1987年12月7日(CD/798和CD/800)。

⁶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莫斯科,1991年7月。

⁷ 关于核查尼加拉瓜选举观察团,详见A/44/642和Corr.1、A/44/834、A/44/917、A/44/921和A/44/927。

⁸ 见S/22031。

⁹ 见S/23402和Add.1。

¹⁰ 见《秘书长关于非洲冲突的报告：关于防止和解决冲突机制的建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五十六届常会部长理事会，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塞内加尔，达喀尔，CM/1710(LVI)）。

¹¹ 见《关于将来不断监测和核查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C节有关部分情况的计划：秘书长的报告》(S/22871和Rev.1)；和秘书长转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第15段编制的计划的说明(S/22872和Rev.1和Rev.1/Corr.1)。

¹² 见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S/23280,附件三)及他就此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进一步报告(S/23363和Add.1; S/23513; S/23592; S/23836和S/23844)。

¹³ 除其他外，见Lawrence Freedman所著《核时代的战备防御》，Adelphi Paper NO.224(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7年)，第3页；Marion W.Boggs所著《力图在外交和战略中界定并限制“进攻型”武器》，密苏里大学研究论文第16卷第一号(1941年，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密苏里大学)；和George Quester所著《在国际制度中的进攻与防御》(Columbia, John Wiley and Sons出版公司)。

¹⁴ 国际联盟，《削减和限制军备会议记录》，B系列，《总务委员会记录》(1932-1936年，日内瓦)，第113页和第116页。

¹⁵ 见Albrecht von Muller 和Andrzej Karkoszka所写“东西方谈判建议”一文，载于Anders Boserup和Robert Neild所编《预防性防御的基础》(1990年，纽约，St. Martin's 出版公司)第138页。

¹⁶ “论苏联的军事理论(草稿)”，《Voyennaya Mysl》，1990年11月30日。

¹⁷ 《论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事理论》，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于1987年5月28日-29日在柏林发表的声明。

¹⁸ “俄罗斯的军事理论(草稿)”,载于《军事思想》1992年5月,第10页。

¹⁹ Mavlies ter Borg 和Wim Smit 所著《非挑衅性防御作为削减军备的一项原则》(1989年Amsterdam Vrije 大学)第1页。

²⁰ Alvin M. Saperstein所著“非挑衅性防御入门”,见《军备控制》第9卷第1号,1988年,第65页。

²¹ Egbert Boeker 和Lutz Unterseher所著“强调防御”,载于Frank Barnaby和Marlies ter Borg、所编《新出现的技术和军事理论:一种政治评估》(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86年)第89页。

²² 除其他外,见Stepher J. Flanagan所写“非洲挑衅性和以民为本的防御”,载于Joseph S. Nye, Jr、Graham T. Allison 和Albert Carnesale合编《命运攸关的观点:避免核灾难》(麻省剑桥:Ballinger出版公司,1988年),第98页;“非进攻性防御”,载于《原子科学家公报》特刊,1988年9月;Anders Boserup和Robert Neild 合编《预防性防御的基础》(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0年);Jonathan Pean 所写“备选性防御:对北约中部前线问题的答案”,载于《国际事务》第64卷,第1号,1987-88年。

²³ 例如,见Klaus Naumann所写“理论和部队结构”,载于Cuthbertson 和Peter Volten合编《枪声消失了:冷战的结束与常规裁军的未来》(纽约,东西方安全研究所,1990年)。

²⁴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由Michael Howard 和Peter Paret编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57页。

²⁵ Freedman所著《核时代的战略防御》,同注(13),第43页。

²⁶ 见国际联盟召开削减和限制军备会议上,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特别委员会向总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会议文件》第一卷(1932年12月,日内瓦)。

²⁷ S/C.3/30, 1948年8月13日。

²⁸ John Mearsheimer所著《常规威慑》(Ithaca 纽约: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26页。

²⁹ 见Tomohisa Sakanaka所写“亚洲国际关系”,载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非进攻性防御:全球观点》一书,(纽约,Taylor and Francis 出版公司,1990年),特别是第121-23页。

³⁰ S/23500。

³¹ 见J. Soedjati Djiwandono所写“非挑衅性防御战略”,载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非进攻性防御:全球观点》一书,(伦敦,Taylor & Francis 出版公司,1990年),第113-117页。

³²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五届特别会议,补编第3号》(A/S-15/3,第60段(所引文件第6段))。

³³ Richard E. Darilek 所写“Have Arms Control, Will Travel: Exporting Confidence-Building and Other Measures from Europe”(未发表的论文,1991年)。

³⁴ 见Rolf Berg所写“在欧洲建立军事信任”一文,载于Allen Lynch所编《在欧洲建立安全:建立信任措施和欧安会》东西方专论系列第2册(纽约东西方安全研究所,1986年),第15至20页。

³⁵ Darileck所写“Have Arms Control, Will Travel”,同注(33),第20页。

³⁶ “第一工作组关于议程项目4的报告”,裁军审议委员会1992年实务会议(A/CN.10/1992/CRP.3),1992年5月8日。

³⁷ “武器控制与裁军计划”(法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1991年6月3日)。

³⁸ “五大国关于武器转让和不扩散问题巴黎会议公报”,1991年7月8日-9日,巴黎。

³⁹ 关于本协议和后来的协议中核查与联络系统之细节,见Itshak Lederman所著《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在核查问题上的经历及其对欧洲常规武器控制的意义》不定

期文件第2号(College Park, 马里兰州; 国际安全研究中心, 1989年马里兰州); 和 Brian S. Mandell 所写“西奈模式: 多方式核查武器控制的教训”, 载于Mandell 所编《返回未来: 区域武器控制与核查经验中教训》渥太华, Carleton大学, 1989年) 第51至80页。

⁴⁰ 亨利·基辛格所著《动荡岁月》(伦敦, Weidenfeld and Nicolson出版公司), 第1251页; 和Lederman, 同注(39), 第7至8页。

⁴¹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审查会议, BWC/CONF. II/13/II, 1986年9月, 第5和第6页。

⁴²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 BWC/CONF. III/23/II, 1991年9月, 第13至18页。

⁴³ 1991年12月6日第46/30号决议是大会就此通过的最新决议。

⁴⁴ 1991年1月9日,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和其他关心国家巴黎会议, 全体会议, “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阿伦斯阁下的发言”。

⁴⁵ 裁军谈判会议, CD/989, 1990年4月20日。

⁴⁶ 29个签字国是: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卢森堡、摩尔多瓦共和国、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土耳其、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⁴⁷ “中东武器控制主动行动实况报道”(华盛顿特区: 白宫, 新闻秘书处, 1991年5月29日), 第2页。